

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 「鄉土文學」： 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

蕭阿勤**

摘 要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之後，在臺灣政治與文化不斷「本土化」的脈絡中，以黃春明、陳映真等人的創作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做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潮流的代表，其出現與發展逐漸被視為臺灣文化朝向本土化變遷的起點。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述說的「臺灣文學史」中，鄉土文學——或者更廣泛的回歸鄉土潮流——被視為替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之發展奠下基礎。在九〇年代臺灣的政治更自由化、歷經激烈的「統獨之爭」而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公開論辯幾無任何禁忌的情勢中，臺灣民族主義者之間又發展出另外一種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理解，亦即認為鄉土小說家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 1977 到 1978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訌與對峙。從八〇、九〇年代迄今，以本土、臺灣為重的取向，逐漸成為文化領域開展思考與決定行動時佔優勢的原則之一。在這種歷史發展中，上述臺灣民族主義者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在臺灣文學史或文化史的認識上，似乎有逐漸取得優勢的可能。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臺灣社會學社主辦，2000 年 1 月 15 日），並曾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週二學術演講進行報告（2000 年 3 月 14 日）。作者感謝研討會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李丁讚教授的評論及兩次與會諸君的批評，這些挑戰使筆者獲益良多。同時也感謝投稿時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原稿在第一節的概念與理論的討論部分，已依審查人的意見，做適當的刪節。然而由於篇幅所限，以及筆者某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未能將審查人一些另外的意見納入本文的討論。筆者希望再有機會針對這些意見做出回應與貢獻。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本文運用文獻資料，一方面探討上述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對鄉土文學的特殊理解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則回溯八〇年代之前，亦即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初起至「鄉土文學論戰」左右，一般——包括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評論家——對鄉土小說出現的歷史文化意義的認識。亦即本文在比較一群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在八〇年代前後對鄉土文學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定位不同的理解，尤其是這些不同的理解與特殊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關係，並且釐清其轉折的過程。

本文藉著這個歷史過程個案的分析，討論「集體記憶」的基本性質，指出所謂的集體記憶主要的構成要素，除了被認定與某一人群有關的過去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意義賦予這些經驗的「參考架構」，亦即一個關於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

本文的結論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與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之間的密切關係，進一步顯示了「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是「互相建構」的：它們是互相形塑而又互相限制的，因此也就是相互辯證的。本文並且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做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或是以預設的歷史演進方向與可欲的歷史變遷結果做為解釋歷史發展的動因。最後本文也指出，民族主義與歷史研究及書寫之間的密切關係，是我們理解臺灣的過去時所必須深刻反省思考的。

關鍵詞：認同、集體記憶、民族主義、鄉土文學、臺灣文學、臺灣史

黃春明、陳映真等人創作的小說，在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逐漸受到重視，而被稱為「鄉土文學」。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之後，在臺灣政治與文化不斷「本土化」的脈絡中，鄉土文學做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潮流的代表，其出現與發展逐漸被視為臺灣文化朝向本土化變遷的起點。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述說的「臺灣文學史」中，鄉土文學——或者更廣泛的回歸鄉土潮流——被視為替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之發展奠下基礎。在九〇年代臺灣的政治更自由化、歷經激烈的「統獨之爭」而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公開論辯幾無任何禁忌的情勢中，臺灣民族主義者之間又發展出另外一種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理解，亦即認為鄉土小說家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1977到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訌與對峙。從八〇、九〇年代

迄今，以本土、臺灣為重的取向，逐漸成為文化領域開展思考與決定行動時佔優勢的原則之一。在這種歷史發展中，上述臺灣民族主義者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發展與論戰的理解方式，在臺灣文學史或文化史的認識上，似乎有逐漸取得優勢的可能。

本文運用文獻資料，一方面探討上述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民族主義者對鄉土文學的特殊理解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則回溯八〇年代之前，亦即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初起至「鄉土文學論戰」左右，一般——特別是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評論家——對鄉土小說出現的歷史文化意義的認識。換句話說，本文的目的不在探討七〇年代以黃春明、陳映真等人的小說為代表的鄉土文學本身的發展，⁽¹⁾ 而是在比較一群後來成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在八〇年代前後對鄉土文學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定位不同的理解——尤其是這些不同的理解與特殊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關係，並且釐清其轉折的過程。

除了探討上述的歷史過程之外，本文的另一個目的，則在藉著這個歷史個案的分析，討論「集體記憶」——特別是集體記憶中的「文化記憶」部分——的基本性質。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是什麼？對「我們」而言，這一段「過去」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對後來臺灣的文學或文化發展，有何關連？這一段過去，和中國民族主義或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有何關係？我們做為一個「中國人」或「臺灣人」，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段過去？當在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與臺灣民族主義者從他們個別的民族主義立場回答上述一連串問題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就在建構關於這一段「過去」的「集體記憶」——亦即建構關於鄉土文學的文學特質、文化意義、歷史定位等的一整套知識內容、詮釋方式等，並且希望「在臺灣的中國人」或「臺灣人」以特定的模式記憶這一段七〇年代的過去。藉著這個個案的分析，本文指出：所謂集體記憶，其主要的構成要素，除了被認定與某一人群有關的過去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意義賦予這些經驗的「參考架構」，亦即一個關於

(1) 關於七〇年代以黃春明、陳映真等人的小說為代表的鄉土文學的發展、鄉土文學在回歸鄉土潮流中逐漸受重視的經過、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的詳情等，至目前為止非常值得參考的是陳正醜與藍博堂兩人的研究。見陳正醜，〈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收於《臺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臺北：人間，1998），頁129-181；藍博堂，〈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1971-198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我們可以說，集體記憶的發展、維持、與變遷，主要也就是它的意義參考架構——亦即敘事模式——的發展、維持、與變遷。

再者，本文在「結論」部分也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與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之間的密切關係，進一步顯示了「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是「互相建構」的，兩者都不應該被當成是先驗地存在的實體，而是不斷地被詮釋與再詮釋的過程。它們的關係，是互相形塑而又互相限制的，因此也就是相互辯證的。本文並且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做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或是以預設的歷史演進方向與可欲的歷史變遷結果做為解釋歷史發展的動因。最後，本文也指出民族主義與歷史研究及書寫之間的密切關係，是我們理解臺灣過去時所必須深刻反省思考的。

一、集體記憶與敘事模式

從集體記憶的角度探討民族主義與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先釐清「集體記憶」這個核心概念，以及相關的「集體認同」等概念的意義，並且討論人文知識份子在建構集體記憶上所扮演的一般角色。

(一) 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

記憶是人們自我的認同 (identity) 形成的一個核心要素。愈來愈多的研究告訴我們：把認同與記憶這兩個基本概念「物化」(reify) 是不恰當的。也就是說，認同與記憶都應該被看成是不斷進行的「過程」，而不應該被當成個人或團體擁有的「物品」。⁽²⁾ 具體而言，認同是我們對「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生活？」、「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等一連串與自我實現相關的問題所提出的答案。換句話說，認同是人們努力了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

(2) Jeffrey K. Olick and Joyce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998), pp. 133-134.

只有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而這種詮釋行動一方面受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另一方面則受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的特質所影響。就集體認同而言，它不是某一類人的某些既存特性的必然產物，也不是他們所面對的情境的某些特質的必然結果。反之，集體認同的建構，是在人群共同特質——譬如他們先前具有的身份與認同、人口數量、內部的分歧、人際網絡、象徵資源、團體的目標等——與情境的機會與限制互動中發生的。⁽³⁾ 集體記憶則是一個人群可能擁有的各種「象徵資源」之一，其它的象徵資源，尚包括傳統、儀式、慶典、服飾、食物與語言、宗教等文化行爲。這些象徵資源，是一個人群「再現」(represent) 自己時所憑藉的方式。

雖然八〇年代以來，集體記憶的研究伴隨著認同研究而蓬勃發展，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對「集體記憶」的概念提出批評。一個常見的批評是：集體記憶是一個指涉過於廣泛，而且意義相當模糊的字眼。譬如 Noa Gedi 與 Yigal Elam 就認為，集體記憶一詞最近在社會科學界流行，似乎被用來廣泛地指稱各種人類認知的產物。他們認為，用這樣的字眼取代以往研究者所慣用、意義較明確特定的概念——譬如「迷思」(myth)、「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概念上的退化。因此他們認為，集體記憶一詞頂多可以幫助研究者提供生動的、說明性的描述，至於做為一種解釋性的工具，並沒什麼用處，甚至使人產生誤解。⁽⁴⁾

不過集體記憶一詞即使指涉廣泛而模糊，恐怕和 Gedi 與 Elam 所指的迷思、刻板印象等概念的一般意義，仍有所區別。迷思、刻板印象等概念，雖然和集體記憶頗類似，涉及的是人對過去經驗的認知，以及這種認知對行動可能的影響，但筆者認為，集體記憶至少在兩方面和這些概念並不相同：第一是集體記憶在時間面向上對「過去」的指涉；第二是它在集體認同因素上的指涉。首先，我們在

(3) Stephen Cornell and Douglas Hartman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1998), p. 231. 張茂桂將 identity 區分為「身份」與「認同」兩個相關的次概念加以討論。簡而言之，具有某種共同身份，是指具有某種社會角色，或屬於某種相對社會關係位置的人群分類範疇；而認同是基於這個身份的集體情感、使命感與行動實踐的自主意識。認同不是自動地因為具有某種身份就必然地產生，而是需要其它行動的催生與激發。見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收於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臺北：月旦，1997)，頁 96-97。本文以下使用「身份」與「認同」二詞時，也意味著這種區分。

(4) Noa Gedi and Yigal Elam, "Collective Memory-What Is It?" *History and Memory* 8:1 (1996), pp. 40, 47.

日常語言中談到「記憶」時，大部分涉及我們回憶對過去經驗的某些印象的能力，而這些過去的經驗往往對我們的心靈有某種影響。就像日常語言中使用記憶一詞時一樣，當我們談到「集體記憶」時，涉及的是一群人維持、發展、與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力、過程、與結果，以及對他們個別成員的與集體的行動之影響。集體記憶概念在時間上主要指涉「過去」，這種時間面向的獨特關懷，卻不是迷思等概念必然具有的。譬如迷思，固然可以指對過去經驗的迷思，也可以用來指對目前社會情況、或未來世界發展的迷思（譬如某種「烏托邦」的思想）。集體記憶研究者對「過去」如何影響「現在」的特殊關懷，未必是研究迷思者所具有的。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說，集體記憶研究就是對人們受過去影響的各種方式——不管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公開的或私密的、物質上的或溝通上的、有共識的或有爭議的方式——的研究。

再者，如同前面提到的，記憶是認同形成的一個核心要素，而我們的認同的一個主要部分，又往往來自社會互動中他人加諸的人群分類，以及我們自己主觀上的集體身份（社群）的歸屬。因此當我們談到一群人的集體記憶時，涉及的是和這群人的集體認同有關的過去，以及這樣的過去和這個集體認同的相互關係。集體記憶概念所蘊含的對集體認同的特殊關懷，卻未必是刻板印象等概念具有的。這一點，也是為什麼在討論與集體認同有關的過去時，使用集體記憶一詞，要比使用未必有集體認同意涵的「歷史詮釋」一詞更加切題的原因。換句話說，與其它涉及人對經驗的認知，以及這種認知對行動可能的影響的概念相比較，集體記憶概念的特殊，就在於他結合了「集體」（對集體認同的特殊關懷）與「記憶」（對人對「過去」的認知如何影響「現在」的特殊關懷）兩個概念。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說，研究集體記憶，主要就在研究和某一群人的集體認同有關的過去，以及它與這個集體認同的發展和相關的社會行動的相互關係。

(二)「集體」、「記憶」、人文知識份子與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

然而集體記憶概念的主要缺點，以及研究者對它進一步的批評，⁽⁵⁾也正在於

(5) 譬如 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Cambridge, MA:Blackwell, 1992), p. ix; Gedi and Elam, "Collective Memory-What Is It?" pp. 34-35; 參考 Olick and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p. 111.

「集體」與「記憶」這兩個字眼所可能隱含的不恰當暗示：「集體」暗示著研究者處理的是一個既存的、具有明顯界線的人群，而他們因為這種明確的身份，自動承載著對過去經驗的某種特殊認知內容；至於「記憶」一詞，則似乎暗示著這一人群做為一個整體，彷彿和生物有機體的個人一樣，擁有心靈，自動地具有記憶的能力。這兩種暗示相互結合，集體記憶就可能被呈現為先驗地存在的、彷彿具有獨立生命的集體心靈。(6)

事實上，所謂的集體記憶一方面往往成為確立認同、動員支持、競奪權力的象徵資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權力爭奪的對象本身之一。就與民族／國家認同有關的集體記憶而言，Eric Hobsbawm 曾以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洲的民族國家與革命運動為例，指出其中存在著職責所在而致力於形塑人們對過去之認知的人。(7) Hobsbawm 所指出的這些人，主要是涉入這種權力競爭的政治菁英與文化菁英。而他們的作為，多半包括對各種異質的集體記憶的排除、壓制、與消滅。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要運用「集體記憶」這個概念，使它成為解釋集體認同的發展、維持、與變遷時有效的概念工具，那麼我們首先必須對其中「集體」與「記憶」所隱含的不恰當暗示與誤解有所警惕。

我們要怎樣理解集體記憶中的「集體」與「記憶」，才是比較恰當的？首先，集體記憶概念中的「記憶」，應該被理解成是發展（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而不應被認為是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對過去的認知。如同前面提到的，集體記憶是集體認同發展所可能憑藉的象徵資源之一。象徵資源做為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再現自己的方式與內容，事實上不同於嵌入例行社會關係中、被視為當然的日常生活活動，而是在一種意義化（signification）過程中被刻意運用的東西。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的集體記憶、傳統、慶典、儀式、服飾、食品等象徵資源往往被用來象徵表達（signify）一種認同，用來標誌、敘說它，也就是用來簡潔地呈現、掌握這個認同對團體成員的意義，或者他們希望別人理

(6) 參考筆者先前就集體記憶研究與理論的開創者 Maurice Halbwachs 對「社會」層次之集體記憶的討論所提出的批評，見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1 (1997)，頁 247-296。

(7)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3.

解的意義。⁽⁸⁾ 我們可以說，這種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過程，包括了象徵表達 (signifying) 的行為與一組象徵資源。藉著這種行為與資源，意義因而被製造出來，也把我們確立為主體 (subjects)。藉著這些意義，我們可以理解自己的經驗，理解我們是誰。換句話說，象徵資源對「我(們)是誰」、「我(們)可能成為什麼」、「我(們)想成為什麼」這些問題提供可能的答案；而再現做為一種文化與社會過程，確立了個人與集體的認同。⁽⁹⁾ 象徵資源被用來象徵表達認同時所具有的刻意的、有意圖的性質，是一般日常生活的文化行為所沒有的。⁽¹⁰⁾ 這種日常生活文化行為與認同建構中象徵資源的運用的不同，也就是 Ernest Gellner 在往日的農民日常生活與被提倡的農民文化之間、Hobsbawm 在「風俗」(custom) 與「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 之間、Thomas H. Eriksen 在民族主義者的父祖輩的日常文化行為與民族主義者要復興的文化傳統之間所做的區分。⁽¹¹⁾ 我們可以說，在團體再現過程中，象徵資源——集體記憶是它的一部分——所產生的意義，主要圍繞在團體「文化特殊性」的確立，藉此一方面發展成員內部認同，一方面與別的團體區隔。⁽¹²⁾

換句話說，所謂的集體記憶，不應該被視為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成員自然、而且必然會保存的對過去的印象。它實際上是經由再現過程，而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的產物，並不同於這些過去的經驗做為生活實踐的本身。某種過去的經驗和某種集體認同的關係，並不是必然的、自動產生的。這種關係的建立和聯繫，往往是再現過程中意義化和象徵化的產物。如果我們考慮到所謂的集體記憶所涵蓋的過去經驗，經常是年代久遠或是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所未曾親身

(8) Cornell and Hartman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p. 226.

(9) Kathryn Woodward,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1997), p. 14.

(10) Cornell and Hartmann, *Ethnicity and Race*, p. 227.

(11)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1;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p. 2; Thomas H. Eriksen, *Us and Them in Modern Societie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Mauritius, Trinidad and Beyond* (Oslo,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12) 關於文化特殊性的強調與集體認同——特別是民族主義——關係的討論，參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 (1999)，頁9-10；A-chin Hsiao (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Chapter 1,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uniqueness" 一節的討論。

經歷的，然而對這些過去的認知卻被其成員繼續發展與維持，那麼我們更容易了解這種再現過程中意義化與象徵化在建構集體記憶上所產生的作用。換句話說，是透過這種再現過程，人們才可能與未曾親身經歷或渺遠的事蹟產生具有某種特定意義的連繫，而這些過去才成爲「記憶」。如果不是因爲某種特定的再現過程中意義化與象徵化的連繫作用，我們無法理解——譬如在臺灣——爲何「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黃帝」或中國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被外國強權壓迫的經驗、臺灣「四百年來」受「外來政權」的統治或平埔族渺遠杳茫的傳統文化，可以成爲建構當代人特定而鮮明之集體認同的「集體記憶」。這種再現過去的過程，是種種社會化機制（家庭、學校、媒體、社會運動、社會團體等）發揮作用的地方之一，也是各種政治與文化的力量互競的場域之一。

再者，所謂集體記憶所指涉的「集體」，也不能單純地、先驗地視爲始終存在而界線明確的一個人群團體。反之，集體記憶概念中所指稱的這個「集體」的疆界與認同，應當被理解成是同時伴隨著這個記憶的建構，才逐漸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說，「集體」與「記憶」兩者是「互相建構」的。⁽¹³⁾ 關於集體記憶做爲一種象徵資源，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人們接近、發展、掌握、與運用象徵資源的機會與能力往往不同。在一個內部的社會角色相當分化的現代社會中，擁有這方面較大機會與能力的，往往是其中的政治菁英與文化菁英，也就是 Hobsbawm 所指出的，那些負責挑選、撰寫、描繪、推銷政治化的「歷史」知識，並將它制度化的一群人。⁽¹⁴⁾ 在現代社會的「認同政治」中，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在某種特殊情境中，政治或文化菁英藉由再現某種過去的經驗的過程，賦予這個經驗與某種集體認同相關的特殊象徵意涵；而經由種種傳播的過程，這個被意義化、象徵化的過去的經驗，逐漸被愈來愈多的群眾所接受——或者說，所「記憶」。⁽¹⁵⁾ 這個過程的另一面是：當人們同意、接受這個過去經驗的特殊象徵意涵時，他們也就同時

(13) 借用數學語言，我們可以說兩者的關係是「互爲函數」的。

(14)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p. 13.

(15) 筆者並不是說這種意義化、象徵化的集體經驗從政治或文化菁英的建構到大眾的接受，是唯一可能的過程與方向。筆者強調的是：這是社會角色相當分化的現代社會中常見的一個現象，而且這個現象，至少正足以說明本文的論點之一，亦即集體記憶概念中的「集體」，不應被視爲始終存在而界線明確的一個人群團體；這個「集體」的疆界與認同，應當被理解成是同時伴隨著這個記憶的建構，才逐漸發展起來的；「集體」與「記憶」兩者，其實是「互相建構」的。

發展與這個象徵意義連結的集體認同面向。集體認同的建構與某種過去經驗的特殊再現方式與過程，幾乎是不分先後、分不開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集體與記憶兩者是互相建構的，而集體記憶所指涉的「集體」，也不能單純地、先驗地視為始終存在而界線明確的一個人群團體。這種互相建構的結果是：這個過去的經驗於是成為逐漸確立這個認同的人們的「集體記憶」。

在那些負責挑選、撰寫、描繪、推銷政治化的「歷史」知識，並將它制度化的人當中，文化菁英中的「人文知識分子」與集體認同建構中象徵資源的掌握與運用，以及意義的生產，關係極為密切。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包括業餘的或專業的文學作家、藝術家、歷史學者、民俗學者、語言學家等等。不管是從他們的個人特質或社會結構位置與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人文知識分子一直是人類社會中極擅於運用象徵資源並生產意義的一群人。譬如在民族主義的發展上，將族群的文化象徵資源轉化為民族文化的架構、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內涵方面，人文知識分子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⁶⁾ 當代臺灣民族主義的階段性發展雖然有其特殊的地方，但相對於政治反對運動人士而言，支持臺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在創造、發展、運用臺灣人集體象徵以建構臺灣民族認同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⁷⁾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更明確地把集體記憶研究放在「文化記憶」的範圍，那麼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更重要。廣泛而言，集體記憶研究如果是對人們受過去影響的各種方式的研究，那麼它可以說包括了 J. Assmann 所區分的四類集體記憶的研究：(一)模擬的記憶 (mimetic memory)：來自過去的實用知識的傳遞；(二)物質的記憶 (material memory)：蘊藏在有形物體中的過去的痕跡；(三)溝通的記憶：留存在語言與溝通行為中的過去的遺跡，包括以語言溝通的能力本身；以及(四)文化的記憶 (cultural memory)：來自過去的意義的傳遞，也就是明顯的歷

(16) 參見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Anthony D. Smith, "The Origins of 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3 (1989);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al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David Aberbach, "Hebrew Literature and Jewish Nationalism in the Tsarist Empire, 1881-1917,"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3:1 (1997), pp. 25-44.

(17) 參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史參照與意識。⁽¹⁸⁾ 這四類集體記憶，幾乎已涵蓋過去影響現在各個領域。對人群集體認同的建構來說，雖然這四種集體記憶都交互影響，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其中尤其以溝通記憶與文化記憶最重要。在這後兩者之中，又以文化記憶的建構與人文知識分子的關係最密切。人文知識分子經常在建立、發展、與維持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參考架構是人群理解他們過往集體經驗並掌握其意義——亦即發展歷史意識——的憑藉。

所謂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具體而言，就是關於過去集體經驗的一個「敘事」(narrative) 模式。敘事是人們再現過去的主要方式之一。⁽¹⁹⁾ 筆者在這裡要借助歷史學者 Hayden White 對「歷史再現」與敘事的分析，以討論集體記憶的重要特質。根據 White 的說法，一個敘事是以時間的演進為中心而建構的；它有一個中心主題，一個有清楚開始、中間、結尾的情節，一個可以確認的敘事者的發言角度與意見；而且它把不同的事件聯繫起來，同時提供一種結局、結論、決心或解決的方案。⁽²⁰⁾ White 並且進一步解釋情節為「一個關係的結構」——藉著它，這個敘事所涵蓋的事件可以被賦予意義，而賦予意義的方式，是確認這些事件為一個整合的全體的一部分。⁽²¹⁾ 雖然 White 討論的是西方史學中再現過去的方式，然而他對敘事特質的討論，相當有助於我們瞭解集體記憶的議題。所謂的集體記憶，也是再現過去的一種過程與結果，它往往也透過敘事的方式來呈現。從這個觀點來看，建立一個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也就是建構關於過去的集體經驗

(18) 見 J. Assmann, *Das Kulte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H Beck, 1992), 引自 Olick and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pp. 111-112。

(19)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James V. Wertsch, "Narrative Tools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Culture & Psychology* 3:1 (1997), p. 10. 根據 Hayden White 的說法，對現代西方史學而言，另外兩種方式是不具有敘事性質的年鑑 (annals) 與編年史 (chronicle)。見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4-5.

(20)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9-21. 在人們的日常工作場所中，解決工作上的新問題，也經常有賴於將新問題放進關於過去工作經驗——尤其是解決難題的經驗——的敘事中去尋求意義，找出解決的辦法。這種敘事的過程與模式，也有助於工作場所中的成員維持集體的認同。參見 Julian E. Orr 關於影印機維修技師的集體記憶與認同的研究：Julian E. Orr, "Sharing Knowledge, Celebrating Identity: Community Memory in a Service Culture,"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 1990), pp. 169-189.

(21)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9.

的一個敘事模式；而掌握個別的集體經驗的意義，就在於確認它在整個敘事涵蓋的經驗的關係結構中的適當位置。我們可以說，過去的經驗正由於被納入敘事而賦予意義的過程，才成爲一種象徵，也才成爲與認同建構有關的象徵資源。或者換另一個方式說：從前面提到的人群再現過程中象徵資源、象徵表達、與意義和主體的確立的關係來看，其中所涉及過去集體經驗的象徵表達過程，主要包括的正是將這個經驗敘事化的工作。人文知識分子擅長、並且在其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的，正在於藉言語、文字、圖像等媒介而將集體經驗「敘事化」、「象徵化」，以確立這些經驗的意義。

當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潮流消退、鄉土文學論戰過後，這些現象對人們來說，開始成爲一段「過去」。「這個過去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當邁入八〇年代的人們從一個特殊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亦即將這一段七〇年代的過去，放到一個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裏，指出它在情節的整體關係結構中的適當位置——他們就在建構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文化記憶，而具有集體認同建構的意涵。八〇年代之後，在臺灣政治與文化領域的本、外省人族群摩擦、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立、統獨之爭的脈絡中，在文學的領域，從中國民族主義與從臺灣民族主義不同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理解本省作家的文學創作發展，一直形成爭議。懷抱不同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家與評論者，根據不同的模式將這一段過去敘事化，發展它在不同的民族主義中的象徵意義。在政治與文化不斷本土化、臺灣化的過程中，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民族）文學」論述似乎逐漸有取得優勢的傾向，而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解說，是這個論述的一部分。本文主要分析的，正是這一個似乎逐漸取得優勢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文化記憶如何地形成與變化。不過在探討八〇年代之後這個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文化記憶形成之前，必須先討論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發展與「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二、一九七〇年代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

由於以與美國的關係爲主的國際局勢改變，臺灣歷經戰後二十年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之後，從 1970 年開始遭遇一連串外交上的挫敗——包括釣魚臺事件、

中共與美國開始「關係正常化」、退出聯合國，以及接連而來的斷交事件。這些外交上的挫折，代表的是挑戰、否認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做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正當性。雖然這些挑戰與否認危及國民黨政府的生存，然而國民黨政府當時在國際政治層面上對這些局勢變化的反應，相當的被動與無力。相對地，這些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卻引起臺灣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政治社會事務公開而積極的關心與行動。就一般的青年知識分子而言，這種公開而熱烈的舉動，是二二八事件之後首次出現的。當時這些積極關懷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而且即使他們可能不是在臺灣出生，也都幾無例外地在戰後的臺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的教育。觀察七〇年代初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公開言論與行動，我們可以說：他們絕大部分在相當程度上已將國民黨所教化的中國民族主義內化。(22) 換句話說，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中間所出現對臺灣前途的熱烈關切，是以一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與情感為基礎的。這種意識與情感，可以 1971 年 6 月臺灣大學學生發動的保衛釣魚臺示威遊行所散發的〈告全國同胞書〉為典型代表：(23)

告全國同胞書

同胞們：

今天我們臺灣大學的學生列隊到美日大使館前示威，乃是要證明中國的領土主權絕不容侵犯。我們要向歷史交待，我們要向世人宣稱：中華民族是一個永不屈服的民族！任何的侵略陰謀均將被我們的正義鐵拳擊碎！

八年抗戰，我們付出了無數軍民的生命；五十年臺澎佔領，我們受

(22) 一般心理與社會科學文獻所謂的「內化」(internalization)，有兩種細微差別的意義，必須加以分辨：一是「嫻熟」或「精通」(mastery)，另一種是「佔有」(appropriation)。前者是關於對外在符號象徵(sign)形式的逐漸掌握，是經由理解社會互動中使用的符號象徵的充分意義，而對社會所界定的活動精通嫻熟。後者是關於文本或規則如何被接受而認為是正當與合理的。一個人即使嫻熟於某種文本或規則，有能力使用它們，並加以反省，但他可能不認為它們是正當合理的。關於內化概念的這種區分，見 James V. Wertsch, *Mind as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本文在這裏所謂的內化，同時包括上述兩方面，見下文的討論。

(23) 根據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3、31，這份文件是由當時臺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王曉波所起草。

盡了日本鐵蹄的蹂躪。然而我們都原諒他們了，今天他們竟再度將其侵略的魔掌伸向我們的釣魚臺列嶼。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百二十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使我們欲哭無淚。我們也知道這不是該哭的時候，我們必須忍著淚把所有的侵略者擊敗，光復大陸，重整山河，才是我們哭祭黃陵的時候！總統告訴我們：

為炎黃子孫爭榮名！

為世界萬國存正義！

同胞們！起來！這是我們保衛祖國的時候了！

國立臺灣大學全體學生啓

這份具有代表性的文件顯示的是：七〇年代初熱切關懷政治社會事務的臺灣青年知識分子，在國民黨的統治與教育下，不僅能嫻熟地掌握、運用中國民族主義相關的符號象徵，並且對他們而言，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臺灣的政治處境，是理所當然、正當合理的。

七〇年代初，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要承載者的中國民族主義，同時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面向，亦即關心社會大眾生活——特別是農、漁民、勞工等社會下層民眾的經濟生活——的社會改革意識。對這些青年知識分子而言，關懷社會大眾的生活，推動社會改革，是保釣運動以來在他們之間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延伸與落實。臺大學生分別在1971年底與1973年春推動的「社會服務團」與「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即為這種關懷的具體表現。⁽²⁴⁾ 一些具有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或甚

(24) 1971年12月，臺大學生組織「社會服務團」，調查農村、都市貧民、勞工、警民關係、選舉等問題。當時主要發起人之一的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王復蘇談到該組織成立始末時說：

保釣運動之後，臺灣的青年朋友們甦醒了。大多數人不再甘為埋首沙中的駝鳥，他們開始對國事、天下事付出更大的關切……繼我國被排出聯合國之後，這個趨勢更明顯了……青年學子們經過了這兩次淚的洗禮，許多青年朋友已經憬悟到校內清談不足濟事，大家在彼此交換意見的時候，都痛切的指出來，青年們除了要作為「社會的氣壓計」外，更需要作為「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這一項基本的態勢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終於觸發了「社會服務團」的基本行動。

……青年們走出學校的象牙塔，一方面能體會到真實社會的面貌，真正的做「貧苦大眾的代言人」；另一方面，青年們更可以經過這個過程而獲得「靈魂的洗禮」，學生運動往往不能長久，效果也不宏遠，其原因就在於缺乏與社會的同聲相求、同氣相應；任何覺醒如果只是浮面的，那麼它一定是短暫的，只有經過意識型態的洗禮才是引導新生的惟一路途。由於有了這個體認，我們準備有所行動了。……

至可能受到美國保釣運動左傾思想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提倡要關心社會下層民眾並改善他們的生活時，也進一步批判國民黨政府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了資本過度集中、貧富不均、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等問題，並且指責外國（主要為美、日）投資為「經濟侵略」。至於外國（主要為美國）文化的大量輸入，則被這些青年知識分子視為「文化侵略」。

七〇年代初發展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中國民族主義，因此包括了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反帝國主義傾向，亦即一方面將臺灣自釣魚臺事件以來在國際政治上的挫折，以及戰後在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問題，歸諸於「帝國主義」的欺凌與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則熱切期望臺灣不能因此屈服，要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能獨立自主。從集體認同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當時熱心關懷政治社會事務與臺灣國際地位的一般青年知識分子，不分本、外省籍，他們對自己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件事，幾乎是毫無疑義、視為當然的。面對七〇年代初以來臺灣的特殊歷史情境，他們在戰後國民黨體制教育與統治環境下發展的中國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激勵了他們在這種情境中的各種反應；而另一方面，這些反應——包括熱烈的公開言論、示威遊行、以及社會服務、奉獻運動等，可以說是對他們先前內化的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目標的一種「再辨識」(re-identifica-

……我們的工作乃是在於加速社會機能的運轉，消除社會的毒瘤，我們是幫助政府尋找膿瘡的醫生，讓政府來開刀，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敵對相反的。

……我們也懇摯的寄望政府有面對問題的勇氣，接納異見的心胸，振衰起弊的誠意與魄力；由此，才能團結人心，重新建立起民眾對政府的信心，用心撫慰海內外嗚嗚望治的民心士氣，並作為未來自由中國另一境界的開始。

見王復蘇，〈臺大社會服務團成立始末〉，收於丘為君編，《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下)》（臺北：龍田，1979），頁847-851。另外，1973年春發起以服務農、漁村、山地村落等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的臺大學生則說：

沒有碧血黃花的壯烈犧牲，就沒有共和中國。沒有「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沒有淚血八年的勝利。歷史的事實昭示我們：多難的祖國需要青年，塗炭的生靈更需要青年。唯有青年能挽救國家，民族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唯有青年能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境地。

在這口號、宣言充斥的年頭，我們恥於埋沒在喧囂聲和廢紙堆中，……一百萬小時的奉獻正足以使我們投身於現實生活，體驗現實生活之苦楚，接受現實生活之考驗，充實空虛的心靈，豎立生活的目標。

見謝復生等，〈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的奉獻〉，收於丘為君編，《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下)》，頁885-886。上述的引言都可以看出：對這些青年知識分子而言，關懷大眾與社會改革是保釣運動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延伸與落實。

tion) 過程。經由這些公開的積極反應、再辨識的過程，替他們的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目標重新注入生命，賦予更實質的內容。當他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並對這種情境做出反應時，其中伴隨發展的、被集體主動而公開地再辨識的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目標，相對於以往國民黨政府所單向教化的內容，因而有了新的面向。上述的關心下層大眾生活的社會改革意識與行動，正是這個新面向中最突出的一點。也正因為這種公開再辨識的過程與性質，所以筆者稱七〇年代初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要承載者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復起的」。

從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之間關係的角度來看，七〇年代初釣魚臺事件之後所出現熱心關懷臺灣前途的青年知識分子在理解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時，主要是把它們放到一個既有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亦即關於中國人、中華民族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中去理解。按照上述 White 所指出的敘事的特質，我們可以把這個敘事模式的要素整理如下：

表一 「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要素

敘事者	中國人、中華民族
時間的演進	十九世紀中期之後、近百年以來
中心主題	中國民族主義：中國追求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建國奮鬥—— 反外國強權的政治侵略 反外國強權的經濟侵略 反外國強權的文化侵略
情節	開始：傳統中國的積極弱不振與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外國強權的欺凌 中間：締造民國共和體制的革命、建國的努力與挫折、外國強權的壓迫侵略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抵抗外國強權的欺凌，追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立自主發展與國家的統一

換句話說，七〇年代初懷抱中國民族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方面把臺灣涉及國際因素的政、經、文化問題，放到上述「情節」——一個以中國與外國強權對抗事件為主的關係結構——中去理解其意義，將臺灣對外國強權的政、經、文化依

賴視為這個情節發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把他們了解社會大眾生活、推動社會改革的嘗試，視為上述「結論或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七〇年代初出現的這種關心社會大眾生活的社會改革意識，因此是涵攝在中國民族主義下對臺灣「土地與人民」的關懷意識。而這種意識，後來就逐漸結合到「鄉土」一詞的詞意中。⁽²⁵⁾七〇年代初之後在文化領域與社會思想方面出現的「回歸鄉土」的趨勢，因此是上述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的結論或解決方案的延伸，而「鄉土文學」的發展與受重視，是回歸鄉土潮流的一個主要部分。我們可以用陳正醜的話來簡單地歸納上面的討論：

這「回歸鄉土」的趨勢反映了七〇年代初期，在國際情勢急速逆轉的背景下，臺灣的知識青年在意識上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對臺灣前途命運的關心因而觸發的「民族／鄉土」意識的高漲；以及含有社會改革意識的、對社會大眾生活的關心，因而形成的「鄉土」取向；還有就是對一向過度模仿西方文化的風氣的反省，因而產生的對傳統文化的再評價等。集中地表現為「回歸鄉土」熱潮的這種七〇年代初期的社會思想和文化潮流，不僅直接促成了大家對鄉土文學的關注，而且間接地造成了鄉土文學論戰。在七〇年代初期的思潮中，年輕世代之間產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特別是其中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意識，不論從它對包括鄉土文學在內的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思想的影響方面來看，還是從它做為社會經濟思想的內容方面來看，都和鄉土文學論戰有直接的關聯。⁽²⁶⁾

三、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與中國民族主義

(一) 日據時期作家作品的重現

七〇年代初釣魚臺事件後從青年知識分子開始發展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調

(25) 陳正醜，〈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頁 138。

(26) 同上註，頁 131。

的社會關懷意識，也逐漸出現在當時文學的領域，因而發展出對文學的「民族性」、「社會性」的要求。1972年到1973年間「現代詩論戰」中所出現對臺灣現代詩的批判，包括批評語言形式上的語義晦澀、過分使用西方意象與句法，內容思想上沈溺於個人情感、逃避當代社會現實，以及指責新詩作者是傳播「帝國主義文化」的「文化買辦」等，都是要求文學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的表現。當時提出這種要求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目標不只限於詩，也包括小說及整個文學領域。在這種文學的發展趨勢中，從1973年開始逐漸出現一些文章，評介戰後一直被忽略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日據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譬如楊逵與鍾理和——與他們的作品，而這些評介逐漸引發文學界對相關議題的關心與討論。(27)

當時在上述的關心與討論中，不管是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或是對日據時期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興趣，可以說都是基於涵攝在中國民族主義下對土地與人民——亦即鄉土——的關懷意識。譬如當時最早以專輯的方式評介鍾理和及其作品的《文季》，便將鍾理和放在該雜誌「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系列中。《文季》的創辦人與編輯之一，正是後來成為鄉土文學主要支持者的外省籍的尉天驄。在該系列中，《文季》編者所加的按語是：

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何其幸運，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

他必須面對封建社會殘留的病根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帶進（筆者按：原文如此）的殖民地流毒，來矗立起自己作品的中國基礎。

他必須面對中國民族的苦難，從事反抗專制集權和恐怖政治的戰

(27) 這方面最早出現的幾篇文章是：顏元叔，〈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1 (1973)，頁106-121；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2:6 (1973)，頁100-112；張良澤，〈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2 (1973)，頁48-59；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11 (1974)，頁32-57；史君美（唐文標），〈來喜愛鍾理和〉，《文季》2 (1973)，頁60-76；劉若君，〈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文季》2 (1973)，頁77-81；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 (1973)，頁4-20；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 (1974)，頁133-165。另外，張良澤有〈鍾理和作品論〉登在《中華日報》副刊（1973年12月13-16日）。當時《文季》、《中外文學》、《幼獅文藝》等並刊載楊逵、鍾理和的舊作。1973年到鄉土文學論戰期間評介楊逵及其作品的文獻書目，參見陳正醒，〈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頁173，註80；河原功，〈楊逵——その文學的活動〉，《臺灣近現代史研究》1 (1978)，頁156-158。七〇年代的「日據時期」、「光復」等用詞，正反映當時基於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歷史意識。本文以下的討論，交互使用「日據時期」或「日本殖民時期」、「光復」或「戰後」等，並未刻意加以區分。

爭，來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國精神。

因此，他不再是一個書齋中的作家，和這社會上的享現成者。他必須走入社會，剷除自私，關心別人，而且要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學習成爲一個中國人。

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何其幸運，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²⁸⁾

又譬如在當時最早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林載爵說：

臺灣新文學運動是這一個沛然浩然的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是受到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實際上也可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大支流。臺灣新文學在困室（筆者按：原文如此）的環境下成長茁壯，工作者在壓制的力量下不斷奮鬥，除了本身具有自足的意義外，更能擴而大之地說明中國新文學在中國近代史上所遭逢的命運。⁽²⁹⁾

再者，在比較楊逵與鍾理和作品所彰顯的精神時，林載爵認爲：

在楊逵的小說裏，我們看到塞西佛斯憤怒的一面，在鍾理和的小說裏，我們看到塞西佛斯沈靜剛毅的一面，當我們不斷擺盪、迷茫於歷史之中，當我們在這人世上日復一日，遭遇愈來愈多的無理時，我們從抗議和隱忍的精神裏，找到了我們的母體、歷史的泉源，因此，我們不再感覺被威嚇，不再感覺孤寂，因爲我們取得了尊嚴。

不管是楊逵的抗議，或者鍾理和的隱忍，他們都是紮根於鄉土之上，他們的血肉裏奔瀉著這塊泥土上的人民的歡樂和痛苦。⁽³⁰⁾

另外，也是當時最早致力於評介、整理鍾理和及其作品者之一的張良澤，在談到他不同意將鍾理和作品的精神詮釋爲「隱忍」時說：

(28) 見《文季》2（1973年11月），頁47。《文季》僅出版三期就停刊，當時這個系列所評介而與鍾理和並列的另外兩位作家是歐陽子（第1期）與張愛玲（第3期）。

(29) 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頁134。

(30) 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頁20。塞西佛斯指希臘神話中的暴君 Sisyphus。他因種種罪孽，受到宙斯（Zeus）的重罰，在地獄無休止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去。每當快推到山頂時，巨石又滾了下來，如此循環不止。

鍾理和不但在作品的意識型態上，表現強烈的民族精神；且在實際行動上，也表現勇於參與、爭取立場的積極面。唯其如此，故作品中流露強烈的愛憎感。就其比重看來，也許使人覺得對我民族愛之深而責之切，對異民族憎之篤而待之怨，此固中國人的胸懷，亦是鍾理和精神所在。(31)

上面的這些例子顯示的是：七〇年代初試圖重新認識、評介臺灣日據時期新文學與日據時期以來本省籍作家與作品貢獻的人文知識分子，不論本、外省籍（譬如林載爵與張良澤為本省籍），就像當時熱切關懷臺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社會改革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與情感。他們重新探究臺灣本地文學資源的舉動，正是七〇年代初反外國強權文化侵略而有意識地尋求文化獨立自主的解決方案之一。

(二)七〇年代的鄉土小說

就在全省籍的尉天驄及其同仁主持的《文季》（1973年8月至1974年8月）雜誌上，我們看到除了刊登對文學現代主義影響下的臺灣現代詩的抨擊之外，⁽³²⁾也首次出現一系列對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的嚴肅批判。對一九六〇年代在臺灣相當佔優勢的文學現代主義，這本雜誌首度展開廣泛的嚴厲抨擊，並且刻意提倡社會寫實主義。《文季》以及之前相關的文學雜誌，⁽³³⁾也培養了陳映真（1936-）、黃春明（1939-）、與王禎和（1940-90）這些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而他們都是本省籍的。雖然《文季》在1974年8月後停刊，但當時的文學氣氛已顯著變化，「鄉土」與「現實」成為文學討論中流行的字眼。在鄉土文學論戰於1977年發生之前的幾年，大量的支持鄉土文學的文章出現在各種雜誌與報紙上。在這期間，本省籍的楊青矗（1940-）與王拓（1944-）也成為另外兩位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³⁴⁾王拓則與尉天驄、陳映真，又同時成為闡釋鄉土文學理論的主要人物。

(31)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頁56-57。

(32) 之前已有海外華裔英國文學學者關傑明對臺灣現代詩的批判。見John Kwan-Terry, "Modernism and Tradition in Some Recent Chinese Verse," *Tamkang Review* 3:2 (1972)。

(33) 亦即《文學季刊》（1966-70）與《文學雙月刊》（1971），它們也都由尉天驄等人所主持。

(34) 呂正惠，《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臺北：九歌，1995），頁57。

鄉土文學的作品主要是小說，而鄉土文學作家最大的共同特色是他們的「寫實精神」。根據劉紹銘的歸納，鄉土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包括：(一)批判日本與美國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文化與經濟方面；(二)要求社會福利改革與財富的公平分配；(三)謳歌小鎮與鄉村「小人物」的基本美德；(四)中國人面對「醜陋的美國人」與「貪婪好色的日本人」無恥粗俗的行爲時，應維持民族自尊。⁽³⁵⁾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許多抱持強烈反共態度的作家和批評家（一般而言，他們絕大部分是外省籍）而言，鄉土文學的發展，無異是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起，而這種文學作品與意識形態在三〇年代左右意味著對國民黨統治的強烈批判。在七〇年代中，國民黨政府無法容忍鄉土文學，主要是因爲它的左翼傾向，以及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近似，並且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從1977年8月到1978年初的鄉土文學論戰——其中包括國民黨主導而特地召開的「全國文藝會談」——這期間對鄉土文學的抨擊，大致上就在譴責其左傾的、工農兵文學的、以及其地域的色彩。

王拓確實曾經明白說過，「鄉土」指的是「臺灣這個廣大的社會環境和這個環境下的人的生活現實」。⁽³⁶⁾對他做爲一個小說家而言，王拓認爲，最重要的任務是運用社會寫實主義的技巧來描繪鄉土的現實，而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臺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³⁷⁾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與楊青矗等人，都表達過類似王拓的看法。⁽³⁸⁾

不過上述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與提倡者的「地域傾向」，並不是和中國民族主義互相對立的一種政治上的分離主義。首先是戰後的二十年，國民黨相當成功地壓制政治反對運動，而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海外發展的臺灣獨立運動，也對島內幾

(35) Joseph S. M. Lau, "Echo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siang-t'u Fiction," in Tien Huang-mao, ed.,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U.S. Policy*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3), p. 147.

(36) 彭瑞金曾指出，當時除了「王拓之外，並沒有一個持鄉土派論者，把鄉土文學的鄉土範疇明確地標定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160。

(37)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流，1978），頁118-119。

(38) 參見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65；楊青矗，〈什麼是健康的文學？〉，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297。尉天驄的觀點，見明鳳英紀錄，〈中國文學往何處去？——中西文藝思潮座談會〉，收於《民族文學的再出發》（臺北：故鄉，1979），頁31。黃春明的看法，見尉天驄等，〈當前的中國文學問題〉，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777。

乎沒有什麼影響。再者，做為戰後最早接受國民黨統治下完整教育的一代，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和前述七〇年代初絕大多數熱切關懷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分子相同，而與重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與本省籍作家作品的人文知識分子也一樣，事實上都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意識。譬如針對鄉土文學太過狹隘而無法反映中國的問題這個批評，黃春明的回答是：「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用中國的文字語言來寫自己周遭環境的生活和問題，這就是我們民族的文學。臺灣地方土生土長的文學，也是我們中國的文學……。」⁽³⁹⁾ 另外，對提倡鄉土文學者有偏狹的地域觀念這種指責，楊青矗回應說：「凡寫的是以中國的某一土地為背景，以當地社會發生的現實，都是中國的鄉土文學……。」他同時又指出：「近來一些知識份子掀起寫鄉土的高潮，無非要作家們不要跟在洋人屁股後面迷失自己，為自己的社會創造自己的東西，提倡的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這是社會的需要，相信大家都沒有偏狹的地域觀念」(斜體字為筆者的強調)。⁽⁴⁰⁾ 在這裏楊青矗很清楚地點出鄉土文學發展的本質是對戰後臺灣過度依賴外國強權的反抗。這些依賴包括經濟上依賴美國、日本，以及文化的西化，尤其以現代主義文學強烈的親西方與個人主義傾向為代表——不過在當時政治高壓的環境下，鄉土文學並沒有觸及國民黨政治統治上的對外依賴。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雖然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就發表他們的鄉土小說，但他們的作品被稱為鄉土文學，並且發展為廣泛受到重視的一種寫作風貌，是釣魚臺事件與接下來的外交挫折之後的事，而且成為這些政治事件所刺激的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一個重要部分。⁽⁴¹⁾ 就像王拓反省

(39) 見尉天驄等，〈當前的中國文學問題〉，頁 777。

(40) 楊青矗，〈什麼是健康的文學？〉，頁 297-298。

(41) 這裡可以用黃春明為例來說明。高天生曾指出，雖然黃春明後來被傳誦的小說幾乎都早已發表在 1967 到 1973 年間，但他奠下聲譽基礎，並成為《文季》以及之前相關文學雜誌的作家群中極受矚目的一位，則要等到 1974 年 3 月《莎喲娜啦·再見》、《鐸》兩本自選集由遠景出版社出版以後。在《莎喲娜啦·再見》一書的再版序（寫於 1974 年 8 月）中，黃春明曾如此描寫他的小說結集出版後受歡迎的情形：

三四個月來，我在好多家書店，看到我的讀者買我的書。在中部的小鄉鎮，看到小書店賣我的書，還特別畫了海報張貼。在年輕人的談話中，聽到我的小說被談論著。還有不少的前輩，在報章雜誌寫文章獎掖我。……對這些支持我的讀者，真有「相見恨晚」的感慨。

其實，我這兩本集子所收集的短篇，大部份都是多年前的作品，為什麼當時的讀者那麼少？支持我的創作路線的人也不多。

雖然黃春明自己歸納他的書再版的原因是「不少前輩的言語或文學的獎掖，還靠了出版者的發行和廣告，也有一部份是運氣，和書與讀者以及讀者的口袋和書店的機遇等等」，不過高天生認為，「1970 年後，日漸高昂起來對周遭關懷的社會風氣和時代潮流，在黃春明小說的寵遇裏，所扮演的角色也該具有

七〇年代上半葉他那一代的許多知識分子的中國民族意識時所指出的，他們「都是在這個〔保衛釣魚臺〕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⁴²⁾ 王拓與其他鄉土文學的支持者所展現的反帝國主義，其實相當類似中國五四運動時代知識分子鼓吹的理念，兩者都出於對外國強權以不平等方式對待並背叛中國民族／國家所感到的義憤。事實上保釣運動中的示威遊行，臺灣大學學生借用的正是五四運動的反帝口號，並將當時的政治處境與五四時期相比擬。對鄉土文學主要作家與支持者來說，戰後臺灣淪落為「經濟與文化殖民地」，以及七〇年代初的一連串外交挫折，正是中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受外國強權宰制欺凌的延續。換句話說，他們所內化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記憶敘事模式，基本上和七〇年代初以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所懷抱的是一樣的（見表一）。而他們也是從這種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來理解自己作品的文化與政治的意義。⁽⁴³⁾

就這種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來說，當時國民黨與一些非官方的批評者指責鄉土文學的地域觀念或甚至政治分離主義，可以說是相當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真正無法見容於國民黨與這些批評者的，與其說是鄉土文學的地域傾向，不如說是隱藏在這些作品社會寫實主義技巧下，對當時既有的社會經濟體制的尖銳批判。對國民黨政府而言，這種批判就像中國三〇年代左傾作家所從事的一樣，是既煽動人心而又危險的——因為它們傷害到國民黨的統治權威，特別是在國民黨與中共對抗之時。不過鄉土文學論戰持續了大約一年，然後在 1978 年初停息，而鄉土文學的發展畢竟沒有受到官方的壓制。論戰之後，這種文學風貌更為人廣泛接受。愈來愈多的作家注意到各種公共的議題，社會經濟的現實比以往更成為寫作的題

相當大的關鍵性吧？」分別見黃春明，《莎哟娜啦·再見》（臺北：遠景，1976），頁 4、6；高天生，《臺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1994），頁 104-106。《莎哟娜啦·再見》在 1975 年發行第 5 版，1976 年發行第 8 版，到了 1984 年已經是第 27 版。見黃春明，《莎哟娜啦·再見》（臺北：遠景，1975、1976、1984 各版），版權頁。《鐮》在 1976 年發行第 7 版，到 1979 年則已發行第 13 版。見黃春明，《鐮》（臺北：遠景，1976、1979 各版），版權頁。《小寡婦》為遠景出版社在 1975 年 2 月所出版的黃春明第三本小說集，同年 12 月就發行第 6 版，到了 1979 年則已發行第 12 版。見黃春明，《小寡婦》（臺北：遠景，1975、1979 各版），版權頁。從這些出版的情形，可以看出鄉土文學在七〇年代受歡迎的程度。

(42)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頁 102。

(43) 這種鮮明的中國民族意識的一個典型表達，見陳映真以許南村為筆名而替王拓第一本小說集所寫的序：許南村（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臺北：遠行，1976），頁 34-35。關於鄉土小說家的中國民族主義，參見下文所討論葉石濤在七〇年代對這些鄉土小說家的看法。葉石濤在當時指出他們是「在祖國的模式裏長大」，「一開始就是道道地地的中國靈魂」，「一群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材，「鄉土」、「現實」、與「人民」成爲文學討論常見的用詞。

(三)另一個「鄉土文學」

然而在七〇年代初陳映真、黃春明等人的小說受到重視而被稱爲鄉土文學之前，事實上，比陳、黃等人年長的本省籍作家早已稱呼日據時期以來本省籍作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創作成果爲「鄉土文學」。從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就人數、知名度、與受重視的程度而言，本省籍的作家一般來說在文學界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1964年4月，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並且在當時就以日文寫作而建立一定聲譽的本省籍作家吳濁流（1900-76），創辦《臺灣文藝》（以下簡稱《臺文》，1964-）。同年3月，十二位本省籍詩人——包括在日本殖民時期就以日文寫作的吳瀛濤（1916-71）、陳千武（1922-）、林亨泰（1924-）等，以及如趙天儀（1935-）、白萩（1937-）等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並受教育的更年輕一代——組織了「笠詩社」（以下簡稱「笠」），並且在6月開始發行《笠詩刊》（以下簡稱《笠》，1964-）。這兩個持續至今的文學刊物與團體在六〇年代初的出現，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本省籍作家首次較有組織的集結。從這個時候開始，《臺文》與《笠》這兩份刊物聚合了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本省籍主要作家，而且同時包括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與在戰後成長的世代。它們登載的作品主要既來自本省籍作家，而它們本身也成爲本省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與文學批評者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從成立之後，這兩個文學刊物與團體一直維持密切關係：兩者部分的成員既相同，也登載彼此成員的作品，支持彼此公開的活動等。從八〇年代初期開始，這兩份文學刊物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逐漸發展與臺灣反對政治運動者——當時以本省人爲主的「黨外」——公開而密切的關係。八〇年代下半葉起，他們更成爲建構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民族）文學」論述的主力，而在推動臺灣文化民族主義上扮演主要的角色。這兩個刊物與團體，以及其活動，因此構成八〇年代初期以來發展的臺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⁴⁴⁾

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的政治與文化領域一方面有本、外省人的摩擦、臺灣意

(44) 參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關於「臺灣文化民族主義」以及相關的「民族主義」的定義，也請參見筆者的這兩個研究。

識與中國意識的對立、以及統、獨之爭等，但另一方面則在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與「黨外」以來反對政治運動者的臺灣民族主義互相激盪、並行發展的趨勢中，以本土、臺灣為重的取向，已逐漸成為文化領域開展思考與決定行動時佔優勢的原則之一。不少具有明顯的臺灣民族主義信念者，參與官方文化活動與決策，而許多臺灣民族主義者及其文化活動，也得到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這種現象，在文學的領域尤其明顯（見本文「五、結論」部分的討論）。在這種歷史發展趨勢中，《笠》與《臺文》的文學批評者與作家做為建構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民族）文學」論述的一群主要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從八〇年代初期以來——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潮流消退、鄉土文學論戰過後——所建構關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文化記憶，在文學的領域也似乎逐漸有取得優勢的傾向。關於八〇年代之後這個「集體記憶」建構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從《笠》與《臺文》的成員在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流行當時、甚至之前的情況談起。

1965年——亦即《臺文》創刊的第二年，同時也是黃春明等人的鄉土小說受重視的大約十年前，在日本殖民晚期成長、曾以日文寫作、並曾支持吳濁流創辦《臺文》的本省籍小說家與文學批評者葉石濤，發表他復出文壇後的第一篇文學評論：〈臺灣的鄉土文學〉。⁽⁴⁵⁾在這篇文章中，葉石濤用「（本省的或臺灣的）鄉土文學」一詞來指稱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當時所有的「本省作家」創作的文學，以便與他所謂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區分開來。本省籍作家——從在日據時期成長並寫作的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吳濁流、陳火泉、王昶雄、葉石濤等，到光復後才創作並成名的鍾理和、鍾肇政、廖清秀、鄭清文等，以及更年輕的季季、林懷民、鍾鐵民，還有笠詩人——都被統稱為鄉土文學作家。葉石濤認為，「本省鄉土文學」的誕生，應當從賴和開始，是賴和的新文學創作「替本省鄉土文學豎起了第一面旗幟」，「奠定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基礎」。⁽⁴⁶⁾對於一直到七〇年代仍處於文學界邊緣位置的本省籍小說家而言，葉石濤復出之後推介他們的大量評論文章，可以說是一大鼓勵。也因為如此，從六〇年代中期至今，特別是在圍繞著《臺文》的許多本省籍小說家的眼中，葉石濤有如他們的庇護者

(45) 葉石濤曾在1951至1954年間因被認為與「叛亂份子」有所牽連而入獄，之後疏離文壇十幾年。

(46)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1965）。

(patron)。(47) 六〇年代中期之後，許多本省籍作家——特別是屬於《臺文》作家群而分別與吳濁流、葉石濤、鍾肇政屬於同世代者，一般就以「本省作家」、「省籍作家」、「本省鄉土文學」，或「臺灣的鄉土文學」稱呼他們自己，甚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作家，以及其作品。(48)

從世代的角度來看，七〇年代中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王拓等鄉土小說家算是戰後第三代的本省籍作家。七〇年代之前，圍繞在《臺文》的本省籍作家，特別是戰後第一、二代小說家，他們一個共同的特色是以明朗平易的文字寫作，專注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周遭的題材，因此發展出樸實、平淡的風格。這些作家在文學或甚至社會政治方面，可以說幾乎沒有意識型態上的特殊關懷。(49) 對戰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現實，他們展現的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規避與反應的遲疑。(50) 七〇年代興起的回歸鄉土潮流對《臺文》的影響，或者說《臺文》對

(47) 曾經被葉石濤譽為「本省作家中的佼佼者」(見葉石濤，〈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臺灣文藝》19 [1968]，頁39)，並且在1976年10月到1982年12月擔任《臺灣文藝》主編的鍾肇政，在八〇年代末如此形容他和其他本省籍作家在六〇年代下半葉後與葉石濤的關係：

在我們的陣容裡評論一直是較弱的一環。故而葉的評論文學顯得格外珍異。我也不憚於指出，他的論文固然深入精到，顯示出他做為一名評論家的深湛學養，然而他的出發點是：「人家不理我們，我們自己來」的伙伴意識，故而揄揚的成份居多。我們可以說是「相濡以沫」的一群，我確認培養一種連帶感，至關重要，這也正是我特別推崇葉石濤的原因之一。

我必需坦白地說，我對他一直有著濃重的依賴感。我總覺得，在我們這一群無助無告的伙伴們當中，有葉石濤其人在，便等於有了一根擎天巨柱，起碼可以撐起一份小小的、可憐兮兮的局面。憑他那一枝評論的、創作的筆，我願意深信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爭得一塊文學天空。

見鍾肇政，〈臺灣文學之鬼——葉石濤〉，《臺灣春秋》8 (1989)，頁318-319。在1965年〈臺灣的鄉土文學〉這篇文章中，葉石濤主要討論的是小說家及其作品。雖然他也提到笠詩人，並認為他們的「新詩在鄉土文學史上應該占有輝煌的一頁」，但同時則謙稱「對於新詩我是門外漢」、「實在什麼也不懂」，因此未多加討論，見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頁73。葉石濤此後的文學評論，也都一直集中在本省籍小說家及其作品。不過即使如此，葉石濤常籠統地稱呼他評論的對象為「本省作家」或「省籍作家」，而未特別指明這些對象其實多半只限於小說作者。

(48) 譬如一直到八〇年代上半葉，鍾肇政在討論包括他自己在內而被他稱為「臺灣光復後第一代作家」——亦即屬於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中稱為「較年長的戰後派」世代的本省籍小說家，而他們在八〇年代末之後則逐漸被稱為「戰後第一代的臺灣小說家」——於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學活動，以及一九六〇年代之後陸續出現的年輕一代本省籍小說家時，仍都稱呼他們的創作為「本省（或臺灣）的鄉土文學」。鍾肇政並且認為「光復後第一代作家」的作品中，質樸的語言風格與本鄉本土的題材，與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遙相呼應，保持了臺灣鄉土文學一脈相承的情況」。見鍾肇政，〈艱困孤寂的足跡——簡述四十年代本省鄉土文學〉，《文訊》9 (1984)，頁127。

(49) 葉石濤，〈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文訊》13 (1984)，頁139。

(50) 《臺文》成員中的文學批評家彭瑞金，在1980年元旦——亦即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曾

這個趨勢的反應，一直要到吳濁流去世後鍾肇政接掌主編時才出現。1977年3月，在鍾肇政主編下第一次出刊的《臺文》，推出了「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這時候距離本文前面提到的尉天驄等人的《文季》推出「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鍾理和」專輯（1973年11月），已將近四年。這個時間的落差，或許可以說明《臺文》作家群與社會政治的疏離與反應的遲疑。在這個專輯中，包括了葉石濤與張良澤對談討論鍾理和及其作品，而擔任主持的彭瑞金則直接說明：這次對談的重點是在探討鍾理和的作品「在臺灣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斜體字為筆者的強調）。⁽⁵¹⁾另外，在1979年《臺文》推出「日據時期臺灣文學日文小說譯作專輯」，登載楊逵、張文環、龍瑛宗、葉石濤等人在殖民時期創作的小說。對鍾肇政而言，「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而最可貴的是他們的反抗強權、熱愛土地與同胞的鄉土文學精神，被傳承到當代，在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裏，成了歷史的對照，交相輝映。」⁽⁵²⁾在這段期間，《臺文》也致力於評介黃春明、楊青矗等人的作品，表達了對七〇年代初興起的鄉土文學的支持。⁽⁵³⁾

至於笠詩人，就他們較為樸實明朗的寫作風格與處理日常生活題材的興趣來說，固然與當時其它重要的詩人團體——譬如六〇年代影響一般詩人甚鉅的「創世紀」詩社的「超現實主義」傾向與「藍星」詩社後來趨向的「古典抒情」——不一樣，但就企圖扮演「中國現代詩人」而創造「中國現代詩」的熱情而言，他們則和六〇年代的外省籍現代詩人沒有太大的不同。正如許多笠詩社成員自己指出的，在推動七〇年代初回歸鄉土潮流、鄉土文學的發展上，以及在後來的鄉土

與葉石濤對談。彭、葉兩人都惋惜王拓與楊青矗因投入反對政治而在美麗島事件中被捕。彭瑞金接著如此描述本省籍第一、二代作家對戰後政治社會現實的態度：「……第一代第二代作家他們一生都執著於一個固定的方向，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無感於任何劇烈的時代變動，只是堅定地執行其既定的寫作理念，以鄭清文、李喬、七等生為例，常要令人懷疑他們無視於時代的幻化，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如果不是從他們呼吸的時代空氣去認識他們，是永遠無法了解他們何以如是遲疑的」。見葉石濤、彭瑞金，〈葉石濤、彭瑞金對談：一年來的小說界〉，《臺灣文藝》66（1980），頁195。在更早的時候與葉石濤對談，彭瑞金也曾指出這些作家「完全規避了現實」，而葉石濤則將這些作家的傾向歸諸於光復後他們生活的不安定，以及因為辛苦學習陌生的祖國語言、歷史、與文化而無暇、無力分析現實。見彭瑞金，〈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訪葉石濤先生談臺灣文學的歷史〉，《臺灣文藝》62（1979），頁17。

(51) 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臺灣文藝》54（1977），頁8。

(52) 見《臺灣文藝》63（1979年7月），頁5。

(53) 參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14-15的討論。

文學論戰中，笠詩社都幾乎沒有扮演什麼角色。(54)

然而即使如此，與《臺文》的作家群相比，笠詩人則更早、也更明顯地受到七〇年代初釣魚臺事件後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的影響。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一直要到 1973 年之後一些評介文章的出現，才引發七〇年代文學界較廣泛地注意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與戰後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作品。不過早在 1972 年 10 月，《笠》就開始推出一個不定期的專欄——「臺灣新詩的回顧」，介紹討論吳新榮（1907-67）、郭水潭（1908-）、巫永福等人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詩作，試圖使讀者注意當時本省籍詩人的詩作成就。在介紹吳新榮、巫永福的舊作時，《笠》並且特地選刊了〈祖國軍來了〉（吳新榮），以及〈孤兒之戀〉與〈祖國〉（巫永福），強調當時本省籍詩人對祖國的嚮往、對祖國解放臺灣的渴望，以及光復時的雀躍。(55) 笠詩人之中，屬於在戰後成長受教育的世代，他們在七〇年代的一些作品，也展現了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譬如趙天儀的〈誰說我們不是幸福的一代〉與李魁賢的「釣魚臺詩集」系列。(56) 李魁賢在 1980 年底就曾經回顧笠詩人大約在 1969 年到 1974 年期間的變化，指出他們從早期鼓吹詩的「語體化」，進一步主張詩要介入生活而挖掘生活題材，強調現實性與社會性，因此「更明顯地加強了民族意識」。(57)

(54) 笠詩社詩人趙天儀、李魁賢、白萩、鄭炯明、陳千武都曾如此表示，分別見《笠》87（1978年10月），頁42-43；120（1984年4月），頁5；103（1981年6月），頁34；130（1985年12月），頁25；《文學界》4（1982年冬），頁182。

(55) 《笠》51（1972年10月），頁92-97；《笠》52（1972年12月），頁5-16。在刊載巫永福的詩作時，《笠》編者的按語是：「在日據時期，本省詩人對祖國的嚮往與關懷，只要讀讀本省詩壇的前輩詩人巫永福先生對『祖國』的呼喚，我們該有多麼沉痛的感受呢？！」見《笠》52（1972年12月），頁9。參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17-20的討論。

(56) 趙天儀的這首詩，見《笠》64（1974年12月），卷頭扉頁。其中有「永遠不能遺忘的一天／是日本人最後的一天／是中國人最興奮的一天／臺灣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以及「誰說我們不是幸福的一代／誰說我們不是幸福的一代／在我們祖國的懷抱裏／我們新生的一代正健康地成長」等詩句。李魁賢的系列詩見《笠》90（1979年4月），頁2-5。其中〈光復釣魚臺〉一首，全詩如下：「爸爸，您又流淚了／我看到您眼中有無限的光芒／爸爸，每次提到臺灣光復／為什麼您都會流下眼淚？／我感到好奇怪／看到黑人爭取自由的影片後／爸爸，我瞭解了／臺灣光復對我們的意義／爸爸，臺灣光復表示／臺灣從此不再是殖民地／已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可是為什麼／我們的釣魚臺又被佔了？／爸爸，我們還沒有光復！／爸爸，我們還沒有光復！」李魁賢另有〈巫永福詩中的祖國意識和自由意識〉一文，見《笠》87（1978年10月），頁2-7。

(57) 見李魁賢，〈笠的歷程〉，《笠》100（1980），頁48。李魁賢並且曾表示：笠詩人「以生活為基調而詠嘆出民族脈動的詩作」，足以選出來成為一厚冊。見《笠》85（1978年6月），頁64。

簡而言之，對七〇年代身處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中的笠詩人來說，「鄉土文化即是中國文化的一環」，而「臺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臺灣文學」——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⁵⁸⁾ 這個時期的笠詩人追求的目標，除了六〇年代以來的詩的「中國性」與「現代性」之外，又增加了「鄉土性」。這種傾向，也就是如趙天儀當時詮釋「鄉土精神」時所主張的：「在現代的中國，在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中國，一個中國詩人，既不是傳統的盲目的繼承者，也不是西方的獻媚的崇拜者，愛護自己的鄉土，歌唱出健康的踏實的音響吧！」⁽⁵⁹⁾

(四)七〇年代葉石濤的文學評論

關於六〇、七〇年代本省籍的作家，除了上述的《笠》、《臺文》兩個作家群一般的情況之外，我們有必要另外討論也是《臺文》成員的葉石濤與其文學評論。從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上半葉楊遠、鍾理和等重新受重視而陳映真等人的作品流行之前，葉石濤幾乎是在小說方面唯一重要的本省籍文學批評者，而他也幾乎是僅有的一位專注於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文學批評家。⁽⁶⁰⁾ 這段期間，在將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世代的本省籍小說家及其作品擺在歷史變遷的脈絡中，以建構其文化與政治的歷史意義這個工作上，葉石濤幾乎是唯一的一位文學批評家。我們可以說，從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上半葉，葉石濤一部分重要的文學批評工作，就在於從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回答「對『我們』而言，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世代的本省籍小說家及其作品意味著什麼？」「它與過去、現在、將來的中國文學發展——包括更廣大的過去、現在、將來的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什麼關係？」等等之類的問題。換句話說，在這個時期，在將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世代的本省籍小說家及其文學活動「敘事化」、「象徵化」而建構成一種「文化記憶」上，葉石濤可以說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58) 《笠》81 (1977年10月)，頁40-43。

(59) 《笠》73 (1976年6月)，頁1。1979年12月出刊的《笠》在徵求新同仁加入的啟事上，對自己的形容是：「追求民族情感歷史的脈搏，期在我們的土地上綻放心靈影顯的花朵」。見《笠》94 (1979年12月)，頁20。

(60) 參見本文註(47)所引鍾肇政的談話。在前面提到的葉石濤於1965年復出文壇後第一篇文學批評文章〈臺灣的鄉土文學〉開頭，葉石濤談到：「打從我會寫幾篇像樣的文章開始，我的心裏始終存著一個熾烈的願望」，亦即「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見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頁70。

在七〇年代初臺灣政治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特殊歷史環節中，葉石濤長期以來的關懷，遂與文學界的變化趨勢——亦即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學「民族性」、「社會性」要求，而對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的臺灣現代文學與本省籍作家作品的重新重視——若合符節。在七〇年代初的政治、文化氣氛中，葉石濤的評論也充滿了當時常見的「祖國」、「中國」、「民族」、「反帝」、「反封建」、「現實（或寫實）主義」等語彙。在七〇年代中期，當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時，葉石濤如此回顧：

在這幾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臺灣新文學一向跟隨著臺灣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而生長，而茁壯，反映了全體臺灣民眾的共同意願；那便是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和自由，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臺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環，它蘊藏著強烈的民族精神，富於豐富的鄉土色彩，充分表達了在異族殘暴統治下痛苦呻吟的臺人心聲。(61)

在這個時候，葉石濤也進一步擴大他對「臺灣鄉土文學」的定義而納入「原住種族」的文學，而不限於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創作現代文學的「漢民族」本省籍作家的作品，並且也涵蓋使用荷蘭、西班牙、日本「統治者的語言」的創作。儘管他更明確地強調所謂的臺灣鄉土文學，必須是基於「臺灣意識」——亦即從荷蘭人殖民統治以來「在臺灣的中國人」被殖民、受壓迫的共通經驗所發展出來的立場、情感、與意願⁽⁶²⁾——的作品，但是對葉石濤而言，臺灣由於地理與歷史因素所「獨得的鄉土風格並非有別於漢民族文化的、足以獨樹一幟的文化，它乃屬於漢民族文化的一支流。」同時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作家表現堅強的現實意識與抵抗殖民者的精神，因此他們的作品發展成現實主義的、反帝、反封建的「臺灣鄉土文學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必定有民族風格的寫實文學」。⁽⁶³⁾從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從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葉石濤關於臺灣鄉土文學的文化記憶建構最基本的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在他 1965 年那篇先驅性的文章

(61) 葉石濤，〈日據時代新文學的回顧〉，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1979），頁 41。

(62) 葉石濤，〈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2-73。

(63) 同上註，頁 71、77。

中，葉石濤如此思考戰後「本省鄉土文學」的前途：

本省鄉土文學在日據時代確實有提倡的必要，藉此發揮民族精神，領導對日本人的抵抗運動，有其必需存在的歷史性，且不容否認已有了輝煌的收穫。但，現在是否可繼續存在，是否有必要特別加以珍視、培養，抑或大聲疾呼的提倡？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實際上年青的一代，「戰後派」作家的心目中，日本人不過是過去的亡靈罷了，這些影子也許尚朦朧的留在記憶裏，那血淋淋的記錄也許尚不能完全抹去，但這些究竟一去不返了。年青的一代既沒有日文的羈絆，他們當然更少畛域的觀念，自然地融化在中國文學裡，更進一步地努力形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翼。這是鄉土文學的最終歸宿，也就是上一代作家夢寐以求的結果。

然而我們是否應該丟棄鄉土文學優美的傳統呢？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由於本省過去特殊的歷史背景，亞熱帶颱風圈內的風土，日本人留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痕跡，同大陸隔開，在並立的狀態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等，並不完全和大陸一樣。生為一個作家這不就是豐富的題材嗎？能發掘這些特質，探求個體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給我們中國的文學添加更廣的領域。(64)

在這時期的另一篇文章中，當葉石濤綜合評論 1966 到 1967 這兩年出現於《臺文》的本省籍小說家與其作品時，則做了如下的總評：

兩年來本省作家的作品已有擺脫地域性的傾向，有些作品的描寫已經不限於本省一範圍，一地區的社會政治、道德的諸問題，更進一步地已含有象徵中華民族通性的境界。將來我們著手重建國家的時候，本省文學中較優秀的作品或成爲一種標準和指歸。

雖然兩年來的本省文學逐漸有打破區域性而昇華為一般性的傾向，但這並非意味著本省的文學業已失去鄉土色彩。鄉土色彩仍能脈脈搏動於每一篇作品之中，就是較前在表現的方式和技巧上有長足的開展罷了……我們並非排擊小說的革新和現代化，我們並非鼓勵大家像埋首沙坵

(64)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頁 73。

的駝鳥，故步自封。然則，忽視了鄉土意識亦即喪失了民族風格，而沒有民族風格的文學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從世界文學潮流來看，本省文學尚侷促於一隅，無論質量皆甚遜色。這時候採長補短，努力把傳統和現代熔於一爐，築成屬於一己獨異的風格，才是正確的方向。⁽⁶⁵⁾

我們可以說，從六〇年代中期復出文壇到七〇年代，葉石濤在這段期間對本省籍小說家再三懇切忠告的，是在創新文字技巧的同時，一方面仍堅持鄉土色彩（特別是在挖掘生活周遭風土人物的現實題材方面），然而另一方面則不能受鄉土「小天地」的區域性、特殊性所拘限。他認為，本省籍小說家應該從探索獨特的鄉土出發，在作品中追尋更廣闊的民族性，甚至更普遍的世界性，刻畫人類共有的人性與存在的情境。⁽⁶⁶⁾對葉石濤來說，臺灣鄉土文化既然是漢民族文化的一支，保存作品的鄉土色彩，也就彰顯了民族風格；所謂鄉土色彩，其實就是「整個中國的地域情感的濃縮」。他認為：即使如本省籍作家在殖民統治下發展的反帝、反封建特質，與中國作家面對列強瓜分侵略中國而展現的文學特點，也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臺灣作家的特質就是中國作家的特質」。⁽⁶⁷⁾對葉石濤而言，本省籍小說家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從鄉土文學提升到中國文學，再到世界文學的境地。七〇年代中期，當他與剛成名不久的鄉土小說家楊青矗一起接受訪問時，曾經更直接地表示：本省籍作家由於生活環境而自然發展的「以現地為依歸」的思考方式，反映到作品中所形成的「鄉土意識假如沒有擴充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更世界性的意識，那麼，這種作品充其量也是『自慰性的歌唱』罷了」。⁽⁶⁸⁾

從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葉石濤對本省籍小說家的諄諄告誡，同樣可以見於他對吳濁流作品的批評中。在八〇年代後發展的臺灣（民族）文學論述中，吳濁流及其作品一直擁有崇高的地位。他在1945年所寫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被臺灣民族主義者認為是具現了臺灣人被外來政權統治、被中國拋棄的「孤兒」

(65) 葉石濤，〈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頁44-45。

(66) 葉石濤，〈吳濁流論〉，《臺灣文藝》12（1966），頁28。

(67) 葉石濤的這些看法，見彭瑞金，〈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頁7。

(68) 見梁景峰，〈文學的旗子——與葉石濤、楊青矗暢談〉，收於氏著，《鄉土與現代：臺灣文學的片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63。

經驗與情感，因而被賦予近乎（臺灣）民族文學經典的評價。然而在1966年7月的〈吳濁流論〉一文中，葉石濤如此地批評：

其實，吳濁流的小說常使人憶起阿普頓·辛克萊的許多巨作，就是少了一些濃厚的世界性和故事性罷了。

把臺灣人的命運看做整個人類生活的一環，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將使臺灣作家走向了坦坦大道，敲開通往世界文學之門，而這正是每一個作家夢寐以求的課題。從特殊的鄉土發掘出發，發揚人性的光輝，繼而昇華為普遍的，人類共有的人性。毫無疑問的，這是大多數臺灣作家所採取的途徑，而這一條路也是正確的。但只是雙腳陷於誇張的鄉土觀念的泥沼裏，久不能自拔，這也使臺灣作家永遠活在閉塞又狹窄的囚籠，變成夜郎自大的狂妄之途。雖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偉大的小說莫不是伸根於鄉土，流露著醇厚的民族性和脈脈搏動的鄉土氣息，但它們卻也顯示了人類共有的人性和命運。……無可諱言的，吳濁流的小說有濃厚的鄉土性，他底小說的主題，永遠是臺灣人及其風土。而常常他底有些小說就是發掘鄉土特殊的制度，風土，人物，歷史和社會，缺乏了高超的人類觀念。因此，有些小說的泥土香頗濃，濃到使人昏昏欲醉。但缺乏了理性主義的火焰，致使他小說裏的人物皆在臺灣的泥土裡打滾，在這小天地裡哭泣，叫喚。

但在臺灣文學史上已經成為古典的長篇大作「亞細亞的孤兒」卻是不落俗套，不落窠臼的一部雄壯的敘事詩。……可惜，小說的技巧和構成皆陳舊，表現方法迂腐，缺乏新鮮的現代人感覺，阻礙著它躋入世界文學之林。

……

……吳濁流不能超越他生長、呼吸的時代。他的思想已染上了過去時代的色彩，他的作家精神未死，他的創造力未衰竭，但我們絕不能期待他再一次有勁的飛躍。臺灣作家較年青的一代已陸續地登場，另一個黃金時代的幕已啓了。(69)

(69) 葉石濤，〈吳濁流論〉，頁28、30。

葉石濤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指明他所謂陸續登場的年輕作家是指那些人。不過就在這篇文章出現後的三個月，尉天驄等人創辦的《文學季刊》（1966年10月-1970年2月）——《文季》的前身——即開始出現。⁽⁷⁰⁾而後來在七〇年代中被重視的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的明朗、寫實、描寫小人物的重要鄉土小說，也就在橫跨六〇年代下半葉的《文學季刊》中陸續出現。⁽⁷¹⁾當七〇年代中加上楊青矗、王拓的作品而使鄉土文學成爲廣泛受重視的文學潮流時，葉石濤熱烈地認爲這「是臺灣作家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這將帶領臺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文學的創造路線上去！」⁽⁷²⁾對他而言，這些戰後第三代的鄉土作家，畢竟與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李喬等戰前世代與戰後第一、二代的作家不同。對這些較年長的本省籍作家來說，臺灣光復後祖國的歷史、文化、語言，以及祖國統治下的社會現狀，都是需要再學習才能夠理解與掌握的。「而大約要到第三代作家，例如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楊青矗、王拓他們就用不著『學習』了，因爲他們在祖國的模式裏長大，他們一開始就是道道地地的中國靈魂，他們可以直接了解這個時代，所以他們回歸鄉土再認民族主義時表現了相當的自信。」⁽⁷³⁾葉石濤進一步說：

第三代作家所處的社會是初期工業化已獲得成功的社會，他們在漸趨豐盈的物質生活中受了較完整的各階段教育，開始反省工業社會帶來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貧困，尋求民族文化傳統之根，因此基於民族主義的抗議和控訴充滿了他們的性靈。不過儘管他們回歸了第一代作家的鄉土寫作路線，但他們顯然跟第一代作家不同，他們關懷的是本地現實生活的各層面，而不是過去統治者的亡靈，他們反對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

(70) 參見本文註(33)。

(71) 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1992），頁46-47、51-52。

(72) 葉石濤，〈現代主義小說的沒落〉，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1979[?]），頁50。1978年11月，葉石濤接受彭瑞金與洪毅的訪問時，認爲「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因爲當時臺灣作家創作努力的目標即符合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主張。訪談時在場的張良澤，也表示同意葉石濤上述的說法。彭瑞金當時認爲鄉土文學論戰的正面意義之一，在於使許多人體認到「鄉土文學應該進一步拓展到民族文學的再認階段」，而葉石濤則回應說：「我認爲不只是民族文學，下一階段的文學應該是進入三民主義的時代。其實鄉土文學根本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現在已不適合拘泥於鄉土文學的『鄉土』兩個字了。」見彭瑞金，〈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頁7、11、30。

(73) 這段話是葉石濤接受彭瑞金與洪毅訪問時的發言。見彭瑞金，〈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頁17。

他們是一群堅定的民族主義者。(74)

在八〇年代初，葉石濤曾以更直接了當且帶有讚許的語氣回顧，指出七〇年代的鄉土小說「已經不是老調的鄉土文學」，並且認為「這可能是新一代的這些作家不太認同臺灣本土意識較強的老一輩鄉土文學，而是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的前途的關係。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吧」。(75)

總之，就民族／國家認同而言，不管是《笠》或是《臺文》的成員——包括葉石濤，在七〇年代時，都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及成果的文化與政治的歷史意義。換句話說，以「(本省或臺灣) 鄉土文學」之名建構關於日本殖民時期以來本省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與成果的文化記憶時，他們的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當他們在界定這些本省人文學現象的文化與政治的意義時，是把它們放到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視為其情節的一部分，進而尋找它們在這個整體經驗的關係結構中的適當位置。「鄉土文學」藉著這種敘事化過程彰顯出來的象徵意義，不只是「(臺灣) 鄉土的」，而且是「(中國) 民族的」。《笠》與《臺文》的成員不管是在理解他們自己於七〇年代當時的文學活動與追求、界定本省籍作家整體未來的目標時，或是認識新起的陳映真等人的「鄉土文學」時，都同樣基於涵攝在中國民族主義下的鄉土關懷意識，並且把他們在當前的追求與未來的目標，也視為上述文化記憶的有機發展與延續。換句話說，他們對「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學生涯與作品的目的與意義何在?」、「我(們)(特別是本省籍作家)的文學創作和臺灣(鄉土)與中國(民族)的過去、現在、未來有什麼關係?」、「當前(七〇年代)的政治社會情境與新興的文學趨勢(鄉土文學)的意義是什麼?」等與認同相關的問題的回答，都是基於一個特定的對過去的理解。我們可以說，他們建構鄉土文學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與七〇年代初政治局勢變動之後出現的政治改革

(74) 葉石濤，〈作家的世代〉，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1979)，頁46。

(75) 葉石濤，〈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頁146。葉石濤在八〇年代的這種看法，參見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討論：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34。葉石濤在1984年的〈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這篇文章中指出七〇年代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鄉土小說家「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的前途」的「進步」時，同時也指出他們「跟老作家吳濁流接觸較少」。見葉石濤，〈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頁146。

關懷與文學民族性、社會性要求中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見「表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不同。這個敘事模式的要素可以整理如下：

表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的要素

敘事者	中國人、中華民族
時間的演進	日據時期以來
中心主題	鄉土文學：從臺灣到中國的歷程—— 從鄉土色彩追求民族風格 從地域特性追求民族通性 從傳統追求現代
情節	開始：日據時期本省鄉土文學做為抗日運動的一部分而開始發展，表現重歸祖國的意志與民族精神 中間：臺灣光復後本省鄉土文學重歸為中國文學的一支，七〇年代初興起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第三代本省籍作家的鄉土文學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追求「鄉土」與「民族」的平衡與融匯，自然地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提升到世界文學的層次

四、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的「鄉土文學」與臺灣民族主義

(一)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 納入

對《笠》與《臺文》的成員來說，七〇年代初之後文學界興起的關懷社會現實的要求，以及對陳映真等人「鄉土文學」作品的重視，無疑在肯定他們長久以來用樸實平朗的文字處理本鄉本土題材的作法。當《笠》與《臺文》的成員從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關懷意識出發來理解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包括他們自己——的文學追求與目標時，他們也逐漸提高對自己的歷史評價，以及對未來的期望，而把他們自己在六〇年代以來的文學活動與成果，視為「真正的」

的鄉土文學，或是鄉土文學的先驅。譬如《笠》在1977年6月於《臺文》上刊登徵求訂戶與稿件的廣告中，除了自許「腳踏實地，為中國詩而再接再勵；逼視現實，為現代詩而開創新局」外，更形容自己的詩刊是「鄉土味的本基地」。(76) 至於在當時主編《臺文》的鍾肇政則說：「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在冷凍達三十星霜之後，邇來已漸漸受到社會上普遍的矚目，……幾乎已形成了一股熱潮。……事實上我們也在默默中努力了一段不算短的歲月，《臺灣文藝》同仁之中更有以血淚交迸的苦節努力了幾許歲月的人。……我們的努力已漸漸有了結果，大規模展示這項成果的日期已不遠。」(77) 在《笠》、《臺文》成員提高對自己的歷史評價與未來期望時，他們也有意地或無意地忽略了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本省籍作家作品在直接促動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潮流上幾乎沒有扮演什麼角色的事實，而籠統地把他們描述成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源頭。譬如當時也參與《臺文》編輯的彭瑞金(1947-)說：「被汨沒三十年的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它的價值有獲得再認的機會，三十年來默默的鄉土潛流終於爆發為七〇年代的文學大震撼。我們不妨問一句：我們為什麼要沒有信心？創作就是最大的真實；文學的種籽可以埋藏很久。」(78)

《笠》與《臺文》成員認為自己代表真正的鄉土文學，這種傾向在八〇年代上半葉他們的政治態度轉變時，更為加強。如筆者在先前的研究所指出的，(79)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以及黨外在八〇年代初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激進行動——包括宣揚具有民族主義特質的「臺灣意識」，催發了《笠》與《臺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在八〇年代上半葉，他們開始與黨外發展公開的密切關係，參與反對政治運動。(80) 也就在這個時期，他們逐漸致力於將本省籍作家所發展的

(76) 《臺灣文藝》55 (1977年6月)，頁5。

(77) 《臺灣文藝》61 (1978年12月)，頁4。

(78) 《臺灣文藝》64 (1979年11月)，頁4。

(79) 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A-chin Hsia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80) 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笠》與《臺文》成員的這些意識與實踐的變化——包括其民族／國家認同的轉變，並非迅速立即、截然可分而沒有曖昧模糊的階段。就不同的個別成員來說，可以理解的是其轉變的程度有強有弱，發生的時間也有快有慢。譬如笠詩人李魁賢、鄭炯明在1980年底——亦即美麗島事件發生一年之後——所寫的文章或發言，仍然表現清楚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見李魁賢，〈笠的歷程〉，《笠》100 (1980年12月)，頁54、59。又譬如鍾肇政一直到1982年夏仍然認為：包括《臺文》在內的鄉土文學，應該追求與「回歸」的價值，是具有「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中國「民族性」。見《臺灣文藝》76 (1982年5月)，卷頭扉頁 (〈每期的話〉)。不過即使個別成員轉變的程度與速度有差別，本

文學「去中國化」，亦即將日本殖民時期以來臺灣（本省）人的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一個具有獨特的「本土化」歷史性格與文學特色的傳統，而這個傳統與五四時期以來的中國（民族）文學進展少有或沒有任何關連。這兩個作家群並且逐漸以「本土文學」——進而以「臺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的稱呼。⁽⁸¹⁾ 在這種過程中，尤其是笠詩社成員，對他們在七〇年代沒有在鄉土文學熱潮與論戰中扮演主動而重要的角色，反而逐漸出現一種正面肯定的態度，宣稱他們當時之所以未曾參與，是因為他們早就「一直走這條〔鄉土文學的〕路，何必做無謂的紛爭。」笠詩人認為，對文字樸實明朗，內容具有社會性、時代性的「真正鄉土詩文學」的自覺與實踐，並非到七〇年代初才出現，而是始於《笠》的創刊，因為笠詩人「一開始就是站穩在根植於鄉土、根源於生活的現實主義詩觀而出發的」。因此他們宣稱，「真正鄉土文學是從『笠』開始」，《笠》「早就播下了七十年代臺灣文壇掀起鄉土文學論戰，而〔使〕臺灣新詩的發展，由國際化轉入鄉土化的種子。」因此《笠》與《臺文》逐漸被他們並稱為「富有鄉土精神的二個文學堡壘」。⁽⁸²⁾

在《笠》與《臺文》成員「去中國化」的「臺灣文學」論述中，「臺灣人」逐漸被建構為歷史上一連串外來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臺灣文學則被定義為反映臺灣人這種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⁸³⁾ 做為這種愈來愈具有「臺灣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文學文化記憶建構的一部分，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也被納入其特殊的敘事模式中，成為其描繪的情節發展的重要過程之一。事實上，最早從這種臺灣民族主義的參考架構而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重新定位的，可能是黨外的臺灣意識提倡者，而他們所提倡的臺灣意識，已經不只是一種對本鄉本土的摯情熱愛，而

文著重的是兩個作家群整體變化的共同趨勢與方向。以李魁賢為例，在八〇年代後他的民族／國家認同逐漸轉變，後來加入1996年10月成立、旨在「完成獨立建國目標」、「建立新而獨立的臺灣共和國」的建國黨，並擔任其第一屆第二任「推展委員會」北區的副召集人。

- (81) 1982年初，三位笠詩社與《臺文》的資深成員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在高雄創辦了《文學界》(1982-88)。在八〇年代，它與《笠》、《臺文》一起成為以笠與《臺文》成員為主的本省作家、文學評論者建構他們獨特的臺灣文學概念的主要場所。
- (82) 以上笠詩人的說法，分別見《臺灣文藝》70(1980年12月)，頁262；76(1982年5月)，頁28；《文學界》4(1982年冬)，頁182；《笠》100(1980年12月)，頁48；102(1981年4月)，頁42；103(1981年6月)，頁34、46；120(1984年4月)，頁5-6、144；128(1985年8月)，頁55；130(1985年12月)，頁25。
- (83) 參見蕭阿勳，〈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26-28。

是兼具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臺灣意識提倡者除了攻擊國民黨的「中國意識」之外，也批判反國民黨的左翼人士——尤其是圍繞在《夏潮論壇》，以鄉土小說家陳映真為代表者——所懷抱的中國意識。從七〇年代以來，陳映真堅定地認為應該從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來理解臺灣的歷史與文學，並且認為葉石濤以本省籍作家作品為主所指稱的「臺灣鄉土文學」，應該正名為「在臺灣的中國文學」。⁽⁸⁴⁾ 因為抱持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陳映真因此成為八〇年代黨外臺灣意識提倡者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譬如當時宣揚臺灣意識的主要黨外雜誌——《深耕》——系統的《生根》上署名陳樹鴻的一篇文章，便批評陳映真對臺灣歷史與「臺灣鄉土文學」的看法。這篇文章並且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與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相提並論，認為它們都是長久以來臺灣意識發展的必然結果。⁽⁸⁵⁾ 稍後陳芳明（以宋冬陽的筆名）於《臺文》發表了後來經常被討論的〈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一文，除了著力抨擊陳映真，並且接受陳樹鴻對臺灣意識的界定之外，在文章一開始就認為 1977 年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是臺灣文學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對陳芳明而言，這個論戰的重大意義之一，即釐清了戰後臺灣文學領域中分別代表國民黨官方與臺灣（本省）人的兩種情感：亦即「反共文學」中的流亡心態、「孤臣意識」與經常以抗日為主題的臺灣（本省）人文學作品中的失落感、「孤兒意識」。陳芳明認為，臺灣作家的「孤兒意識在論戰中得到過濾提煉的機會，把徬徨無依的心態化為對臺灣本土的強烈認同」。⁽⁸⁶⁾ 在同時期的另一篇文章中，陳芳明更肯定地認為：五〇、六〇年代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等人的「孤兒文學」，衍生發展成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重要精神。⁽⁸⁷⁾

在八〇年下半年，亦即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笠、《臺文》成員與反對政治運動者的關係益形密切，也更進一步參與反對政治運動。在島內臺灣獨立運動明顯推進的這段期間，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的文學活動與結果，成為臺灣民

(84) 陳映真這種看法的典型陳述，見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臺灣文藝》55 (1977)。

(85) 陳樹鴻，〈臺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收於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頁 194。

(86) 宋冬陽，〈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86 (1984)，頁 13。陳芳明於 1984 年 3 月，亦即這篇文章發表後的兩個月，開始以另一筆名「陳嘉農」，列為《臺文》的同仁。見《臺灣文藝》87 (1984 年 3 月)，版權頁。

(87)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10 (1984)，頁 128。

族主義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八〇年代下半葉到九〇年代以來，他們在建構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上，正扮演主要角色。做為這一波文化論述的主要部分，以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為主所發展的臺灣文學論述在九〇年代以來更加激進。除了將臺灣文學「去中國化」之外，他們更進一步將它「民族化」，亦即一方面將臺灣文學的源起溯自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傳說、歌謠等，將它詮釋為具有多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則將整個臺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臺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的臺灣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換句話說，臺灣文學被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被再現為一個獨特的「臺灣民族」的文學傳統，而「臺灣民族文學」的概念因此被建構出來。(88)

在八〇、九〇年代之交葉石濤出版的《臺灣文學史綱》(1987)與彭瑞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可以說是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的臺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臺灣)民族化」的中間發展階段的典型代表。(89)在這時期，這兩群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的臺灣文學論述比以往更明白直接地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與反對政治的發展聯繫起來，視它為具有臺灣意識的反對政治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對他們而言，1963年《笠》與《臺文》的出現，代表具有反國民黨統治與反中國民族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的明白確立，而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夕，這種臺灣意識已成熟。(90)這場論爭的焦點，因此被他們視為是關於「國家認同」的。(91)它甚至「使得本土的鄉土意識高昂，而導致美麗島事件」，以及八〇、九〇年代之交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92)至於臺灣本土政治運動因美麗島事件而受挫，則被認為正如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藉由鄉土文學運動進行本土化的意願，受

(88) 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29-38。1991年12月，原來創辦《文學界》的鄭炯明等人再度於高雄創辦《文學臺灣》，成為九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發展臺灣（民族）文學論述的另一個主要園地。

(89) 這期間這個論述的一個精簡的表達，見葉石濤，〈撰寫臺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收於氏著，《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頁13-15。彭瑞金的書出版後不久，葉石濤認為它是「迄今為止出現的臺灣或中國的臺灣文學史或者斷代史中」，「較能符合由臺灣人的觀點來描述臺灣文學史此種要求的一本力作」。見葉石濤，〈撰寫臺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頁21。

(90) 這是彭瑞金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具有代表性。見陳芳明、彭瑞金，〈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臺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24（1987），頁39。

(91) 陳芳明，〈家國半世紀——臺灣的政治與文學〉，《文學臺灣》2（1992），頁79。

(92) 杜國清，〈「笠」詩社與臺灣詩壇〉，《臺灣文藝》118（1987），頁20。

到嚴厲阻礙和打擊的情形一樣」。(93) 這時候的葉石濤，已明顯改變他在八〇年代初之前的政治態度與民族／國家認同，於是也宣稱「鄉土文學論戰本來是整體臺灣人爭取自由、民主運動冰山的一角而已」。(94)

我們可以說，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初，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轉變與上述對臺灣的文學發展經驗的特殊再現方式與過程，幾乎是同步並進、分不開的。首先，這個「臺灣（民族）文學」論述中所涉及特殊的臺灣人或臺灣民族的集體疆界與認同內容，事實上是同時伴隨著這個論述的發展，才逐漸建構起來的。而在另一方面，這種以特殊的方式意義化與象徵化的文學發展經驗，因為這種特殊的再現方式而與特定的集體認同聯繫起來，於是成為建構臺灣人或臺灣民族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簡而言之，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集體與記憶是互相建構的；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是互相依賴、無法分開的。

從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在「臺灣（民族）文學」論述中所佔的位置，我們可以說，這個階段民族／國家認同轉變中的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逐漸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納入以臺灣民族主義為參考架構而發展的臺灣（民族）文學的文化記憶中，成為其敘事情節進展的一環。一方面他們不再像七〇年代那樣，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理解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與成果的文化與政治意義。這些成員不再將它們視為中國民族主義敘事模式要素中的「臺灣（或本省）鄉土文學」，而是逕直地稱之為「臺灣（民族）文學」。另一方面，他們逐漸從臺灣民族主義的角度，重新理解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與論戰的文化與政治的意義，亦即確認這個發展與論戰在臺灣（民族）文學敘事模式的情節整體關係中的適當位置，以彰顯它們在確立臺灣意識、激發反對政治運動上的象徵意義。這個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要素，以及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在其中的地位，可以臚列如表三。

因此，雖然在七〇年代中，促使陳映真、黃春明等人的小說受重視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激發的回歸鄉土潮流，而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本省籍作家——以笠詩社與《臺文》的成員為主——在引發當時的鄉土文學熱潮與論戰方面並沒

(93)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頁195。

(94) 葉石濤，〈撰寫臺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頁22。

表三 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的要素與一九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在其中的位置（一：納入）

敘事者	臺灣人、臺灣民族
時間的演進	臺灣有史以來，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一九二〇年代以來
中心主題	臺灣文學：描寫、反映臺灣人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過程—— 多族群的文學發展起源 描寫、反映臺灣人被外來統治者壓迫與反抗的歷史經驗 描寫、反映臺灣人渴望自由解放、追求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意願 不附屬於任何外來統治者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獨特文學發展
情節	開始：數千年前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日本殖民期做為文化抗日運動一部分的臺灣新文學開始發展，表現追求自主的臺灣意識 中間：戰後本省籍作家艱困孤寂地創作，以「鄉土文學」之名延續了臺灣文學的傳統 六〇年代《笠》、《臺灣文藝》的創刊代表臺灣意識的確立 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代表臺灣意識的成熟 八〇年代中鄉土文學、本土文學終於正名為臺灣文學 九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獨立自主的「主體性」在確立中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促進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建立，確立擁有主權的臺灣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

有扮演什麼明顯、直接的角色，但到了八〇年代之後，七〇年代的這一段文學發展，卻逐漸被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建構為臺灣民族主義參考架構下的臺灣（民族）文學文化記憶的一部分。始終抱持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而與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相當對立的陳映真，曾經回顧本省籍作家的民族／國家認同轉變與上述臺灣文學文化記憶的建構，而他的描述相當符合本文所分析的歷史過程。陳映真如此

回顧：

七〇年代當時臺灣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一仍深信臺灣和中國的歷史的、文化的、認同上的以及事實上的聯繫性和統一性。和中國文學對立的、分離主義的「臺灣文學」概念，在七〇年代幾乎是沒有的。……自新詩論戰以迄政治上肅殺陰霾的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今之臺獨派文學界大老、作家、詩人、評論家和理論家，幾乎沒有一個人有站在分離論的臺灣文學上出來發言的直接或間接的紀錄。(95)

戰後，以鍾理和和第一代《臺灣文藝》為代表的作家，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素樸的寫實主義作家，他們的作品的第一個特點也就是沒有政治的或固定社會意識型態；其次，他們真誠的、熱情的、甚至是傑出的去描寫生活，描寫五〇年代前後的臺灣農村生活。然而，從五〇到七〇年代，在臺灣全面西化的現代主義時期，他們一直都是比較弱小的底流，卻也強韌地一直堅持他們的風格。但是這個底流在八〇年代，特別是一九七九年後開始衝出地表；以前是地下水，現在冒出來一條溪流。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了，衝擊了臺灣知識份子，各方面都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大家深深感覺到臺籍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政治人才，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感情在美麗島事件中又起了激變，一些人感到：本省籍人士原來是受到壓迫的，臺灣人知識份子受打擊的。這種感情深遠而且激烈，在政治界和文藝界活動的臺灣省籍年青知識份子，有相當大的一部份人受到這個事件的衝擊和影響……所以心中就產生了悲憤。於是提出「臺灣文學」的概念，探討「臺灣人」是什麼？「臺灣文學」是什麼？「臺灣」是什麼，這種身份認同的問題在臺灣內部引起了廣泛的注意。(96)

(95) 陳映真，〈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聯合文學》158 (1997)，頁 64。

(96) 《海峽》編輯部，〈「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訪陳映真〉，《海峽》(中國) 1987年六月號。

(二)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 排除

從九〇年代初以來，臺灣的政治更自由化。在 1993 到 1995 年前後，臺灣社會更經歷了「統獨之爭」最激烈的時期，此後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公開論辯，愈來愈沒有禁忌。在這種情勢發展中，我們看到在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文化記憶建構中，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與論戰逐漸被賦予另外一種不同的象徵意義。亦即和上述的敘事化方式——將七〇年代這一段文學「納入」，詮釋為臺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的一部分——不同，相對地，反而是將這一段文學發展「排除」在外，視為全由中國民族主義者進行的活動與結果。換句話說，這種「排除」的文化記憶建構過程，顯示更顯豁、更強烈的臺灣民族主義傾向。這種建構，仍然可以彭瑞金與葉石濤的論說為代表。

前面提到，七〇年代當葉石濤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參考架構下詮解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本省籍作家的「鄉土文學」與做為戰後本省籍第三代小說家的陳映真、黃春明等人的鄉土文學的歷史意義時，同時也指出這兩群不同世代作家的差異，認為陳、黃等七〇年代的鄉土小說家已是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而他們較能從整個中國的角度來思考臺灣文學的發展，是一種進步。然而到了八〇年代末的《臺灣文學史綱》，葉石濤對七〇年代的鄉土小說家的中國民族主義，已不再贊賞為進步，⁽⁹⁷⁾ 而是相反地認為黃春明、陳映真等「《文學》、《文季》季刊的較年輕一代的作家，雖然仍以臺灣社會現實為創作的題材，但他們卻從更廣大的第三世界或整個中國的觀點來處理題材，顯然與《臺灣文藝》的固執於鄉土有所分別。……他們以大陸的變遷來衡量臺灣現實……但在政治體制上，今之『大陸』非日據時代的『祖國』，所以他們的思想缺乏現實的基礎，無法落實」。⁽⁹⁸⁾ 至於彭瑞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則批評尉天驄等人主編的「《文季》走向群眾、擁抱世界，面對時代、生活參與的文學主張……雖與本土意識文學沒有矛盾，卻並不認同更樸實、真確的本土文學，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的文學背負了『中華

(97) 見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 123。參見筆者另一篇文章（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 34）的討論。

(98)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 171-172。

民族的命運』的包袱，另一方面……卻看不到就在眼前的臺灣人民，他們文學上的人道主張，只是一種不被自己批判的虛偽」。(99) 彭瑞金更進一步認為，那些「實際紮根於土地」的本省籍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作家，只默默地旁觀了鄉土文學論戰，而那些「鄉土文學的擁護派卻剛好正是反對本土意識抬頭的死硬派」。(100)

九〇年代末，葉石濤一方面更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七〇年代初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以言論或行動投入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的事實，而認為那完全是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行動。另一方面他對於以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為主的本省籍作家——包括他自己——一直到七〇年代，都是把日本殖民時期到當時的本省籍作家的作品視為中國文學的一環、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詮釋其意義的這些事實，也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葉石濤如此地回顧七〇年代：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發生釣魚臺事件。這使得海內外跟臺灣有關的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狂熱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浪潮下的遊行示威活動。但這民族主義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完全無關。因此，並沒有成為臺灣人參與的活動，主要主導者為海內外外省族群精英。(101)

七〇年代末期發生的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可以看出尉天驄、王拓、陳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傾向於「在臺灣的中國文學」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並不認同臺灣為弱小新興民族的國家。而臺灣文學壓根兒不存在，存在的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學」，而臺灣所產生的文學，壓根兒就是鄉土文學……國民黨派的舊民族主義作家，在這一點認同上，應該跟新民族主義者沒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新民族主義者，是思想較進步較有現代主義觀念的一群人，他們認同中國的新革命，對工、農、兵弱勢階層的窮苦生活有重厚的關懷和同情……。

……

(99)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頁 126-127。

(100) 同上註，頁 166-167；彭瑞金，〈鄉土文學與七〇年代的臺灣文學〉，收於氏著，《臺灣文學探索》（臺北：前衛，1995），頁 254。

(101) 葉石濤，《臺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1997），頁 143。

從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去回顧第三次鄉土文學論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主張獨立自主的臺灣作家和知識份子，在這論爭中始終都缺席。而當年的新民族主義者和舊民族主義者現今都走向共同的路徑，一直嚮往於中國的統一，他們之間的歧見也就越來越少了。(102)

換句話說，對葉石濤而言，臺灣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催生的，而論戰則不過是新、舊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訌與對決罷了。這樣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文化記憶的建構，不再將它視為臺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的一部分，反而是將它排除在外。這種以彭瑞金、葉石濤的論說為代表的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的要素與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在其情節中的位置，可以整理如下：

表四 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的要素與一九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在其中的位置（二：排除）

敘事者	臺灣人、臺灣民族
時間的演進	臺灣有史以來，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一九二〇年代以來
中心主題	臺灣文學：描寫、反映臺灣人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過程—— 多族群的文學發展起源 描寫、反映臺灣人被外來統治者壓迫與反抗的歷史經驗 描寫、反映臺灣人渴望自由解放、追求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意願 不附屬於任何外來統治者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獨特文學發展

(102) 葉石濤，《臺灣文學入門》，頁46-47。類似的詮釋，見林瑞明，〈現階段臺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文學臺灣》3（1992），頁15。葉石濤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視為「第三次」，而他所謂的第一次，發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一九三〇年代，第二次發生在戰後的1947到1949年。關於這兩次論爭的研究，譬如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前衛，1996），頁43-48、105-132；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Chapters 2 and 3。

情節	<p>開始：數千年前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日本殖民期做為文化抗日運動一部分的臺灣新文學開始發展，表現追求自主的臺灣意識</p> <p>中間：戰後本省籍作家艱困孤寂地創作，以「鄉土文學」之名延續了臺灣文學的傳統 六〇年代《笠》、《臺灣文藝》的創刊代表臺灣意識的確立 七〇年代真正的本土作家冷眼旁觀中國民族主義者內訌的鄉土文學論戰，默默創作與集結，並重新尋回日本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傳統 八〇年代中鄉土文學、本土文學終於正名為臺灣文學 九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獨立自主的「主體性」在確立中</p> <p>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促進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建立，確立擁有主權的臺灣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

五、結論

(一) 集體與記憶的相互辯證：互相建構與互相限制

從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我們看到以笠詩社、《臺文》為主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評論者理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的文化與政治意義的參考架構，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轉變到臺灣民族主義的。在七〇年代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中，他們以「(本省或臺灣) 鄉土文學」之名建構關於日本殖民時期以來本省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與成果的文化記憶、理解他們自己在當時與未來的文學活動與追求、界定本省籍作家整體未來的目標、或認識新起的陳映真等人的「鄉土文學」時，他們的意義參考架構或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對當時的他們而言，陳映真等人的創作活動為代表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理想，是值得肯定、進步的文學發展趨勢。當這些本省籍的作家與文學評論者受到七〇年代初臺灣特殊的政治社會變遷與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的激發，而將自己文學生涯的意義與目的和中國民族主義明顯地聯繫起來時，他們事

實上和七〇年代初大多數熱切關懷臺灣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自己的中國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目標經歷了一種「再辨識」的過程。他們從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再一次確認自己文學生涯的意義與目的，也就再一次定位、認識了（或者說建構了）自己。

然而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八〇年代以來，當他們反國民黨的政治社會意識逐漸發展，並且參與反對政治的同時，他們關於文學方面的意義參考架構或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也逐漸轉向臺灣民族主義的。他們在民族／國家認同層次的集體認同的變化，和他們關於「臺灣文學是什麼？」、「臺灣文學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做為一個『臺灣人』，應該怎樣理解臺灣文學？」的回答，是同時發展的。於是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也成為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文化記憶的一部分，被「納入」為其敘事情節發展的一環。做為這個文化記憶的成分之一，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代表臺灣意識的成熟，是臺灣人反對政治有機組成的一部分，激發了後來許多反國民黨的政治社會行動。從九〇年代初以來，當臺灣社會經歷了激烈的「統獨之爭」，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論辯、不同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都幾無禁忌的時候，笠、《臺文》成員對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文化記憶的建構，則進一步顯示更強烈的臺灣民族主義傾向。於是七〇年代這一段文學發展，被視為完全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催生的，而論戰則只是一場新、舊中國民族者之間的內訌與對決。換句話說，七〇年代的這一段過去被「排除」在臺灣意識、臺灣（民族）文學的發展之外，不再被視為臺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的一部分。

從上述七〇到九〇年代變化的分析來看，首先我們可以說，構成一個集體記憶的要素，除了被認定與某一人群有關的過去經驗（譬如本文所討論的「鄉土文學」）之外，主要是一個意義的參考架構或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而集體記憶的發展、維持、與變遷，主要就是它的意義參考架構或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發展、維持、與變遷。換句話說，集體記憶不僅涉及「記憶什麼」的「內容」層面，更涉及「如何記憶」的「意義」層面，而意義層面的發展，主要是藉著將某種經驗內容納入特定敘事模式中的敘事化過程。過去的經驗因為被敘事化才成為一種與敘事的中心主題相關的象徵，也才成為建構認同可資憑藉的象徵資源。換句話說，過去的經驗只有以特定的方式被記憶，才可能與某種認同關連起來。

再者，這個個案分析顯示的是：集體記憶概念中的「集體」與「記憶」兩者

的關係，不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係。集體記憶議題中涉及的集體疆界與認同的建構，與對某種特殊集體經驗的內容與意義的建構，是互相依賴、無法分開的。當人們處在特定的情境中，在集體的層次上理解、思考「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生活？」、「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等等問題而有所反應時，即使某種既有的對過去集體經驗的認知做為團體特質而對這些反應有特定的影響，事實上這個對過去集體經驗的認知，也往往在這個特定的情境中被人們篩選、重組、增添、或排除某些成份——亦即被重新建構。如果我們說，集體認同是在團體特質與情境特質的互動中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那麼我們同時可以說，集體記憶做為集體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在團體特質與情境特質的互動中不斷進行的對過去集體經驗的詮釋行動。記憶研究與認同研究的不可分，正代表認同與記憶原是一體的兩面，而僅僅只是為了認識上的方便（或者說，其實是因為認識上的限制與不方便），所以我們才在概念上區分了兩者。

這樣理解下的集體記憶，如同本文開始所指出的，其中的「集體」不能簡單地、先驗地視為始終存在而界線明確的一個人群團體；「記憶」則應該被理解成是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而不是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對過去的認知。集體與記憶兩者，往往是「互相建構」的。這種互相建構的關係與過程，經常見諸於現代社會的認同政治中。在認同政治的發展過程中，文化或政治菁英往往藉著發展某種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而將某種集體經驗敘事化、象徵化，於是將這些以特殊方式認知的集體經驗轉化成「集體記憶」，成為呈現、標誌、敘說某種集體認同的象徵資源。那些與集體行動相關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它們的形成、維持與變化，和集體行動的發展一樣，都是需要被解釋的社會現象，而不應該被簡單地當成用來解釋集體行動的獨立變項。至少，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集體記憶與認同兩者需要被解釋的時候，恐怕不會少於可以用它們來解釋其它社會現象的時候。這在社會快速變遷的階段，尤其如此。

同時在這種理解下的集體記憶概念，也承認所謂集體與記憶的互相建構，事實上也就是「互相限制」，而因此兩者的建構，不可能是任意而毫無節制的。首先，人們往往是因為某種共同的身份，才在某種歷史情境中擁有類似的經歷，遭遇相近的命運；或者他們因為這種共同的身份，因而才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傳承了某些對過去相當一致的理解；另一方面，人們也往往因為類似的歷史際遇與命運、

對過去的共同理解，因而才在社會互動中維持、強化自己或他人對這種共同身份的認知。所以集體的身份，在相當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可能記憶的內容與方式，而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內容與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集體身份與認同的建構。因此我們可以說，集體記憶現象中所涉及的集體與記憶是互相限制的。也正因為集體與記憶兩者互相建構而又互相限制，所以我們可以說兩者的關係是「相互辯證」的。

當我們理解到在人群共同特質與情境特質的互動中，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事實上是處在相互辯證的關係，那麼我們一方面就承認人群既有的共同特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記憶與認同的建構，而另一方面也承認歷史情境對記憶與認同的建構的影響力。我們看到七〇年代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與八〇年代之後政治反對運動與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對圍繞在《笠》與《臺文》的本省籍作家、文學批評者的文學的文化記憶與民族／國家認同的重大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做為本省人的共同身份、從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以來做為本省人的某種共同歷史處境與生活經驗、對日本殖民時期以來本省籍作家處境與文學成果的某種認識等等因素，是他們文學的文化記憶與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的基礎。這些共同特質既是資源，也是限制，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或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中，按照不同的「中心主題」，發揮不同的作用。我們可以說，集體記憶與認同——人們如何回答「我（們）是誰？」、「我（們）的過去是什麼？」，不僅是「（屬於特定）歷史的」，也往往是「（屬於特定）政治的」。

（二）集體記憶：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

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之後，以笠與《臺文》成員為主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批評者，將他們的文學生涯聯繫到民族／國家認同議題上，對「我（們）是誰？」「某一段（文學的）過去究竟是什麼？它對我們的意義為何？」這些問題做出前後不同的回答與抉擇。如果我們承認記憶與認同的建構，都是人們在情境中不斷進行的詮釋與再詮釋的行動，是人們努力了解所處的情境並做出反應的產物，那麼對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就類似上述的一連串關於自我實現的問題所做的任何回答與抉擇，我們應該要有一定的尊重。畢竟基於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以及對

這種選擇的容忍與尊重，是我們這個時代珍視的價值之一；而自己選擇如何面對過去、在當下與未來成為怎樣的人，以及尊重、容忍別人這方面的選擇，正是這一類價值實踐的一個重要部分。

然而在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政治與文化中——尤其是在民族主義方面，人們往往只能選擇加入或被排除，只能選擇成為「我們／同類」或「他者／異己」；而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足以團結人群的巨大力量，一部分也正來自排除、壓制、消滅異質記憶，並且將他者／異己的認同污名化。本文討論的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不管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或臺灣民族主義的，都說明了集體記憶與認同的這種內聚性與排他性。從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到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人們或者接受前者的集體記憶內容與方式而排斥後者，或者接受後者而排斥前者，兩者少有相容的餘地。一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不僅其中的情節部分是一個整合的關係結構，而且從敘事者、時間的演進、中心主題、情節、到結論或解決方案，事實上環環相扣而形成一個封閉的、帶有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的理解過去的方式。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不容有模糊曖昧的地帶，它預設了人們或者全盤接受，否則就一概拒絕。

建構集體記憶以確立認同並動員支持，幾乎是所有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重要過程之一。我們可以說，民族主義者對過去的重視與依賴，使他們成為最具有「歷史意識」的社會行動者之一。然而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使民族主義者對過去的理解事實上往往是「非歷史的」，或甚至是「反歷史的」。首先，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民族主義者經常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譬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從八〇、九〇年代之交以來，圍繞在《笠》與《臺文》的本省籍作家、文學批評者逐漸將1963年《笠》與《臺文》的出現，視為反國民黨、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意識的明白確立，而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夕，這種臺灣意識已成熟；鄉土文學論戰則被他們視為是關於國家認同的，並使得本土的鄉土意識高昂，而導致美麗島事件與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然而從他們在七〇年代對一般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的接受，以及他們自己所發展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來看，實際的歷史過程與他們在八〇年代之後的建構，有相當的距離。

再者，在本文分析的文學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中，不同的民族主義各自設定

了臺灣文學發展可欲的演進方向（見表二與表三、四中「時間的演進」與「中心主題」的差別）與變遷結果（見表二與表三、四中「結論或解決方案」的差別）。在這種理解過去的方式中，預設的歷史演進方向與可欲的變遷結果，反而往往成爲解釋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因。譬如在八〇年代上半葉之後，圍繞在《笠》與《臺文》的本省籍作家、文學批評者逐漸致力於將本省籍作家所發展的文學「去中國化」，亦即將日本殖民時期以來臺灣（本省）人的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一個具有獨特的「本土化」歷史性格與文學特色的傳統，而與五四時期以來的中國（民族）文學進展少有或沒有任何關連。「本土化」做爲可欲的演進方向與變遷結果，反而逐漸成爲解釋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因。就如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序〉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發願寫臺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outline），其目的在於闡明臺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臺灣性格。」⁽¹⁰³⁾ 又譬如八〇年代下半葉到九〇年代以來，以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爲主的本省籍作家、文學批評者除了將臺灣文學「去中國化」之外，更進一步將它「民族化」。以「臺灣（民族）文學」的建立做爲可欲的演進方向與變遷結果，使他們將整個臺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臺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臺灣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而我們也看到，不同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建構了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現象應該被記憶的不同內容與意義（見表二與表三、四中鄉土文學在「情節」中地位的差別），賦予它在各自的文學集體經驗敘事中的不同地位。不過從筆者先前的研究與本文的分析，⁽¹⁰⁴⁾ 我們可以知道：主要是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的政治行動與意識型態動員，才明確地使《笠》與《臺文》的本省籍作家、文學批評者涵攝在中國民族主義下對本鄉本土的真情摯愛，躍升、轉化爲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化理念與實踐，並且同時批判、揚棄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分析結果所呈現的歷史進程，迥異於基於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的文學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所展現的歷史過程。

特定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做爲一種認識歷史的企圖，對於理解實際的過去，往往少有幫助。即使這些特定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只是做爲刺激我們認識

(103)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 ii。

(104) 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過去的一個引子，或引導我們認識過去的一個開端，也都是害多於益的。特定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往往妨礙我們理智清明地從過去學習到某些更有益的東西——特別是謙卑、容忍、與耐心。大部分時候它們主要的作用反而是鼓動人們激越的情緒與行爲——就像它們在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中壓制異質記憶、將他者／異己的認同污名化所發揮的那樣。基於民族主義的特定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不只浮現於本文分析的臺灣民族主義的「臺灣文學」敘事模式。在八〇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快速發展的臺灣文學研究中，基於中共關於中國統一之主張的特定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更是連篇累牘，俯拾即是。

(三)理解臺灣的過去：「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

九〇年代中期以來，一個逐漸發展的現象是：愈來愈多具有明顯的臺灣民族主義信念者，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而愈來愈多的臺灣民族主義者及其文化活動，也得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這種現象，在文學領域尤其明顯。譬如在1998年底，曾任《臺文》編輯委員或顧問的林央敏、宋澤萊、呂興昌所主編，提倡「臺語文學」、具有強烈臺灣民族主義主張的「臺語精選文庫」五冊，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撥款部分補助而出版。⁽¹⁰⁵⁾ 1999年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籌設，任務為「展現臺灣文學全部成就」的機構，經立法院法制、教育委員會決議定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一名，於是經由國家的立法與行政運作，逐漸確立。⁽¹⁰⁶⁾ 又譬如1999年8月，鍾肇政獲得「第三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文學類）」，而彭瑞金與曾任《臺文》編輯委員的林衡哲為該屆六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成員。同時笠詩人李魁賢與曾任或目前仍擔任《臺文》編輯顧問的許達然、陳萬益，則為該屆六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成員。⁽¹⁰⁷⁾ 李魁賢並且擔

(105)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規定而設置，於1994年10月由總統令公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並於1996年1月底成立。這個組織由國家挹注基金，但由民間經營，贊助各項藝文事業等。林央敏為建國黨員，並擔任該黨第一屆第二任「推展委員會」桃竹苗地區的召集人。

(106) 1997年2月，教育部同意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後改名為真理大學）設立第一個大學教育體制內的「臺灣文學系」，由七〇年代末赴日而被列入海外反國民黨人士黑名單的張良澤擔任系主任，同年夏開始招生。1999年6月，教育部又同意國立成功大學籌設臺灣文學研究所，隔年招生。

(107) 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三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專輯》（臺北：該會，1999），頁75。

任該基金會 1999 年下半年及 2000 年度文學類評審委員會主席，而呂興昌、陳萬益，與曾為《臺文》同仁的吳錦發則為其餘六名委員中的成員。⁽¹⁰⁸⁾而 2000 年 3 月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更可以視為近三十年來臺灣反對政治的一大勝利與政治本土化、臺灣化的高峰。陳水扁在 5 月就職後，鍾肇政隨即被敦聘為有給職的資政；而長期以來是《臺文》作家，並且擔任其總編輯（1994 年 2 月至 1995 年 12 月）、現任臺灣筆會會長的李喬（1934-），也被延聘為有給職的國策顧問。⁽¹⁰⁹⁾

在這種政治與文化趨向本土化、臺灣（民族）化的發展中，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關於「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現象是什麼？參與其中的是誰？它對現在的我們（臺灣人）意味著什麼？」等所建構的知識，或許將成為佔優勢的「臺灣人（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普遍的本土化、臺灣化的趨勢，事實上也發生在人文與社會學科的領域，尤其是在臺灣歷史研究方面。臺灣史的研究已不時被譽為九〇年代以來的「顯學」——雖然實際的情形有待更詳細的評估。基於本文就民族主義與關於臺灣一九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的綜結，筆者在前面指出：集體記憶與認同——人們如何回答「我（們）是誰？」、「我（們）的過去是什麼？」，不僅是（屬於特定）歷史的，也往往是（屬於特定）政治的。這樣的認識，對於一位在這塊土地上嚴肅從事臺灣歷史研究者——特別是對探討民族／國家認同相關議題者而言——的啓示至少是：身處八〇年代之後臺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臺灣化已發展到相當程度的今天，有必要深刻反省二十多年來的這種特殊的政治與文化的發展，與研究者本身的臺灣歷史研究有何關係？更具體而言，這些反省包括：八〇年代之後文化領域中開展思考與決定行動時以本土、臺灣為重的取向，在什麼時候成為理解臺灣過去的助力？反之，這種傾向在什麼時候卻成為阻力？我們對於臺灣過去的（特殊的）興趣、理解的方式，與八

(108) 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訊》14（1999 年 10 月），頁 23。李魁賢為建國黨員，參見本文註(80)。

(109)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不久，笠詩社與《臺文》兩團體的主要成員，譬如巫永福、葉石濤、李喬、楊青矗、李敏勇、趙天儀等，倡議進一步將反國民黨而具有鮮明臺灣意識的文化菁英組織起來。1987 年 2 月「臺灣筆會」於是成立，以楊青矗為首屆會長，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則為主要會員與領導幹部，而《臺文》也自此到 1990 年 2 月成為這個新團體的機關刊物。鍾肇政也曾擔任該會會長。關於臺灣筆會與民進黨成立後的反對政治的關係，參見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 31。

〇年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發展，彼此有怎麼樣的關係？一個比較恰當的理解臺灣過去的方式（如果有的話——而這是任何一位嚴肅從事臺灣歷史研究者所苦心追求的——至少是寧願相信它存在的），與當代臺灣政治、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這種比較恰當的關係又如何實踐、反映在研究——亦即對臺灣過去的理解——上？

特別是在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情勢中，對臺灣歷史的研究、對臺灣過去的理解，與這樣的民族主義之間比較恰當的關係是什麼？⁽¹¹⁰⁾ 從十八世紀末現代的「民族」觀念形成以來，歷史的研究與書寫即經常與民族／國家的締造過程密不可分，譬如在西歐的四個主要國家英、法、德、義即如此。在十九、二十世紀中，這四個民族國家的許多歷史研究者的歷史撰作，致力於為其各自的民族認同提供歷史的正當性。這些作為，已經被指出隱涵許多的謬誤與危險。⁽¹¹¹⁾ 然而在這種作為之外，是不是只有下列的另類的選擇（alternative）呢？——「歷史研究者今天可以做好的，不是在建構各種民族／國家認同上，繼續和政府與國家維持邪惡的結盟關係，而是要揭露這些認同其實是多面向的、纖弱易碎的、有爭議的、而且是始終處於創造與再造的狀態中的。……在將民族／國家認同的概念去本質化（de-essentialising）時（而且，特別是在質問哪些人從民族／國家認同的宣傳普及中得利時！），歷史研究者有助於防止民族主義的擴散……。」⁽¹¹²⁾ 在上述相當對立的兩個選擇——和政府與國家、或者和反對現存國家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維持「邪惡的結盟」，或是相反地，揭露這種「邪惡」、揭露民族／國家認同可疑的本質——之外，在民族主義與歷史研究及書寫的關係上，還有其它相對上比較恰當的關係，以及把這種關係轉化為研究實踐的可能嗎？一位探索自己所屬社會之過去的歷史研究者——尤其是針對民族／國家認同相關的議題時——與自己所屬

(110) 關於八〇年代之後「臺灣史觀」興起與臺灣史研究發展的關係，參見筆者先前的研究：A-chin Hsia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Chapter 6.

(111) 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2) 這是英國歷史學者 Stefan Berger 等人最近在綜合批判西歐四個主要國家英、法、德、義過去兩百年的「史學民族主義」（historiographic nationalism）後的結論與主張。見 Stefan Berger, et al., "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in 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3.

社會的當代政治社群建構的恰當關係是什麼？

思考不同的民族主義對臺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的關係，同時反省上述的這些問題時，筆者不禁想到德國古典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 1917 年以〈學術做爲一種志業〉爲題演講，面對一群景仰他的年輕知識份子力促他說明他的信念時所做的結語。⁽¹¹³⁾ 他說：

在我看來，爲了宗教皈依而犧牲理知的人，比講臺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爲〕後者沒有瞭解到，在教室範圍內，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不過，這種知性上的誠實，要求我們指出：在今天，所有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主的許多人，所處的情境，和以賽亞預言所記的流亡時期以東（Edom）的守夜人那首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境，完全一樣：

有人從西珥不住的大聲問我：「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你們如果再想問些什麼，回頭再來吧。」聽這段話的那個民族，已經詢問並等待了兩千餘年了，我們知道他們令人戰慄的命運。從這件事，我們要汲取一個教訓：只憑企盼與等待，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我們應走另一條路：我們要去做我們的工作，承擔應付「眼下的要求」（Forderung des Tages），不論是在人間的事務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業（Beruf）方面。只要每一個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並且對祂服從，這個教訓，其實是平實而單純的。⁽¹¹⁴⁾

就民族主義與歷史研究及書寫之關係的主題來說，在嚴肅地從事臺灣歷史研究者的生命之弦上，那個能撥奏出恰當的曲調的魔神是否存在，使得這樣的研究者能夠服從於祂，堅定地走他的路，承擔應付「*眼下的要求*」呢？

(113) H.H. Gerth & C.Wright Mills, 〈韋伯小傳〉，收於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臺北：遠流，1991），頁 8。

(114) 韋伯，〈學術做爲一種志業〉，收於韋伯著、錢永祥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頁 167。

引用書目

- 王 拓
1978(1977) 〈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100-119。臺北：遠流。
- 王復蘇
1979(1972) 〈臺大社會服務團成立始末〉，收於丘為君編，《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下)，頁 847-851。臺北：龍田。
- 史君美(唐文標)
1973 〈來喜愛鍾理和〉，《文季》2: 60-76。
- 宋冬陽
1984a 〈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86: 10-40。
1984b 〈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10: 127-146。
- 李魁賢
1978 〈巫永福詩中的祖國意識和自由意識〉，《笠》87: 2-7。
1980 〈笠的歷程〉，《笠》100: 36-53。
- 呂正惠
1992 《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
1995 《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臺北：九歌。
- 杜國清
1987 〈「笠」詩社與臺灣詩壇〉，《臺灣文藝》118: 13-23。
- 林瑞明
1992 〈現階段臺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文學臺灣》3: 12-31。
- 林載爵
1973 〈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 4-20。
1974 〈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 133-165。
- 明鳳英(紀錄)
1979(1977) 〈中國文學往何處去?——中西文藝思潮座談會〉，收於《民族文學的再出發》，頁 10-35。臺北：故鄉。
- 河原功
1978 〈楊逵——その文學的活動〉，《臺灣近現代史研究》1: 137-158。
- 洪三雄
1993 《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
- 高天生
1994(1985) 《臺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市：前衛。
- 韋伯(Max Weber)
1991 〈學術做爲一種志業〉，收於韋伯(Max Weber) 著、錢永祥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頁 132-167。臺北：遠流。
-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1999 《第三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專輯》。臺北：該會。
- 梁景峰
1995(1976) 〈文學的旗子——與葉石濤、楊青矗暢談〉，收於氏著，《鄉土與現代：臺灣文學的片斷》，頁 59-80。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許南村(陳映真)

1976 《知識人的偏執》。臺北：遠行。

《海峽》編輯部

1987 〈「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訪陳映真〉，《海峽》(中國)六月號。

黃春明

1975(1974) 《莎喲娜啦·再見》，第5版。臺北：遠景。

1976(1974) 《莎喲娜啦·再見》，第8版。臺北：遠景。

1984(1974) 《莎喲娜啦·再見》，第27版。臺北：遠景。

1976(1974) 《籬》，第7版。臺北：遠景。

1979(1974) 《籬》，第13版。臺北：遠景。

1975 《小寡婦》，第6版。臺北：遠景。

1979(1975) 《小寡婦》，第12版。臺北：遠景。

陳正靛

1998(1981) 〈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收於《臺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129-181。臺北：人間。

陳芳明

1992 〈家國半世紀——臺灣的政治與文學〉，《文學臺灣》2: 73-82。

陳芳明、彭瑞金

1987 〈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臺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24: 17-46。

陳映真

1977 〈「鄉土文學」的盲點〉，《臺灣文藝》55: 107-112。

1978(1977) 〈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53-68。臺北：遠流。

1997 〈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聯合文學》158: 57-76。

陳樹鴻

1988(1983) 〈臺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收於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頁191-205。臺北：前衛。

尉天驄等

1978(1977) 〈當前的中國文學問題〉，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761-785。臺北：遠流。

彭瑞金

1977 〈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臺灣文藝》54: 7-16。

1979 〈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訪葉石濤先生談臺灣文學的歷史〉，《臺灣文藝》62: 5-31。

1991 《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

1995(1991) 〈鄉土文學與七〇年代的臺灣文學〉，收於氏著，《臺灣文學探索》，頁250-259。臺北：前衛。

游勝冠

1996 《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前衛。

楊青矗

1978(1977) 〈什麼是健康的文學？〉，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297-299。臺北：遠流。

張良澤

1973a 〈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2(6): 100-112。

1973b 〈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2: 48-59。

1974 〈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11): 32-57。

張茂桂

- 1997 〈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收於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91-116。臺北：月旦。

劉若君

- 1973 〈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文季》2: 77-81。

葉石濤

- 1965 〈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 70-73。
 1966 〈吳濁流論〉，《臺灣文藝》12: 25-30。
 1968 〈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臺灣文藝》19: 37-45。
 1978(1977) 〈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69-92。臺北：遠流。
 1979a(?) 〈日據時代新文學的回顧〉，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頁 41-43。臺北：遠景。
 1979b(?) 〈現代主義小說的沒落〉，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頁 49-50。臺北：遠景。
 1979c(?) 〈作家的世代〉，收於氏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頁 41-43。臺北：遠景。
 1984 〈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文訊》13: 137-146。
 1987 《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1992(?) 〈撰寫臺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收於氏著，《臺灣文學的困境》，頁 13-23。高雄：派色文化。
 1997 《臺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

葉石濤、彭瑞金

- 1980 〈葉石濤、彭瑞金對談：一年來的小說界〉，《臺灣文藝》66: 180-197。

鍾肇政

- 1984 〈艱困孤寂的足跡——簡述四十年代本省鄉土文學〉，《文訊》9: 122-134。
 1989 〈臺灣文學之鬼——葉石濤〉，《臺灣春秋》8: 314-337。

顏元叔

- 1973 〈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1): 106-121。

謝復生等

- 1979(1973) 〈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的奉獻〉，收於丘為君編，《臺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下)，頁 884-891。臺北：龍田。

蕭阿勤

- 1997 〈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1): 247-296。
 1999 〈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 1-51。

藍博堂

- 1992 〈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1971-198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Aberbach, David

- 1997 "Hebrew Literature and Jewish Nationalism in the Tsarist Empire, 1881-1917."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3(1): 25-44.

Assmann, J.

- 1992 *Das Kulterelle Geda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aet in frue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H Beck.

Berger, Stefan, et al., eds.

- 1999a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b "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In 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pp. 3-14. London: Routledge.

-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1998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Eriksen, Thomas H.
1992 *Us and Them in Modern Societie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Mauritius, Trinidad and Beyond*. Oslo,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 Fentress, James, and Chris Wickham
1992 *Social Memory*. Oxford, UK: Blackwell.
- Gedi, Noa, and Elam, Yigal
1996 "Collective Memory-What Is It?" *History and Memory* 8(1): 30-50.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rth, H.H. & Mills, C. Wright
〈韋伯小傳〉，收於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頁 4-41。臺北：遠流。
- Halbwachs, Maurice
1992(1941,195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 1-1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au, A-chin (蕭阿勤)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Hutchinson, John
1987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al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 Kwan-Terry, John
1972 "Modernism and Tradition in Some Recent Chinese Verse." *Tamkang Review* 3(2): 189-202.
- Lau, Joseph S. M.
1983 "Echo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siang-t'u Fiction." In Tien Huang-mao, ed.,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U.S. Policy*.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Olick, Jeffrey K., and Robbins, Joyce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140.
- Orr, Julian E.
1990 "Sharing Knowledge, Celebrating Identity: Community Memory in a Service Culture."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 169-189. London: Sage.
-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9 "The Origins of 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3): 340-367.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Wertsch, James V.
1997a "Narrative Tools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Culture & Psychology* 3(1): 5-20.

1997b *Mind as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ayden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oodward, Kathryn

1997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 1-6.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Nationalism and “*Hsiang-t’u* Literature” of 1970s Taiwan: A Study of Change,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chin Hsiau*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s 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hsiang-t’u* literature” 鄉土文學, a genre developed in Taiwan during the 1970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new literary genre was originally motivated by a rekindled Chinese nationalism of the 1970s. In the post-1980 period, however,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hsiang-t’u* literature was reshaped by an emerging Taiwanese nationalism.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collective memory consists mainly of a structured narrative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tha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 Finally, the paper critiques the evolutionary and teleological exces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that might constitute a barrier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past.

Keywords: identity, collective memory, nationalism, *hsiang-t’u*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history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